桓仁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辽宁省桓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7·12

目　录



唐聚五

救国爱民　誓师抗日

王忠杰　供稿

（一）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者铁蹄践踏我国东北三省，蹂躏我三千万同胞，烧杀奸掠，无所不用其极，惨状目不忍睹。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后的决议》提出：“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东北爱国军民，面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瞋目切齿，同仇敌忾，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唐聚五在桓仁县树起东北军抗日的一面旗帜——辽宁民众自卫军。声势浩

大，发展迅猛，威震中外，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壮我民魂国威，削煞日寇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军民抗日救国斗志，为后来驱逐日寇、光复国土的英雄业绩，写下不朽的一页。最后，他扑倒在抗日战场上，时年四十一岁。临终前，在弹火横飞的抗日前沿阵地上还对部下说："万一发生不幸，这伙抗日队伍不要分散，要团结起所有的抗日力量挺进东北。不要消极，不要悲观，别怕困难……"

唐聚五殉国后，我冀中军区和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华北分会，以及重庆国民党政府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他抗日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八日，我党《新华日报》发表了《追悼唐聚五将军》的社论，指出："当此东北同胞在艰苦的条件下，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着英勇奋斗时，我们认为最惋惜的事，这就是唐聚五将军的逝世。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在'九·一八'事变后，唐聚五既先在辽宁东部之桓仁地方领导义军起义，高高地在东北举起抗日的旗帜，转战经年，写下了英勇的战绩。自

'七·七'全国抗战发动后，唐聚五复又奉命出关，曾在冀东一带歼灭了不少敌人，而终以在激战中受伤两次，于去年五月十八日在平台山伤亡。"社论又说，"唐将军的死，是我们东北同胞英勇奋斗，是我们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桓仁人民将世世代代怀念抗日民族英雄唐聚五将军；也永远不会忘记四月二十一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它是桓仁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二）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桓仁镇南关师范学校操场内，高搭彩台，军警沿街密布，直至会场，维持秩序。

会场正门，扎碧绿松枝为牌楼，纵横用蓝、白布缠织成棋盘式方格透孔，密缀艳丽纸花，高挂红、绿彩绸数丈；左右交叉中华民国党、国二旗；横额悬纸匾，书"誓师起义"四个大字；两侧分悬"涤荡丑虏，还我山河"长条巨幅；周围遍贴种种抗日标语。

主席台座北向南，高阔庄严，气势雄伟。台后正中敬悬孙中山总理遗像，台中密插党、国小旗，台前

列摆宰杀之猪羊。台额平悬白布一幅，大字书写“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会场正中高竖幡杆，四条彩绳由杆顶分牵于会场四周，彩绳插系各色小旗，迎风映日，锦带彩虹一般。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男男女女，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摩肩接踵，争先恐后，自黎明到日出，络绎不绝，约万余人，聚满会场和邻近街巷。内有朝鲜族人数百名。男女学生手执各色标语小旗排队而至。

上午十时许，抗日誓师大会隆重举行。会场上，彩旗招展，群情激奋，无不欢欣鼓舞。唐聚五等起义组织者与各方代表骑马进入会场，掌声骤起，欢呼雷动，久不止息。唐聚五等绕场一周，招手致意，遂即登台按誓师典礼程序开会。

一、宣布开会。鸣放铁炮三响，惊天动地，声震八方。

二、全体肃立。人们昂首挺胸，如劲松林海。

三、升旗奏乐。此刻鼓号齐鸣，音韵悠扬激昂；青天白日旗徐徐上升，迎风飘扬。

四、唱国歌。歌声嘹亮，如同海潮林涛。

五、民众救国会授总司令军旗就职。由救国会委员长王育文亲手交予总司令唐聚五。会场内刹那间鼓乐大作，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六、全体民众将士向神坛致祭，向天地诸神行三鞠躬。焚香帛，放鞭炮，奏乐毕，唐聚五即就职宣读誓师词。他说：

“邦家不幸，横罹咎殃，倭寇逞凶，犯我界疆。半载以来，贼势弥张，凡我人民，痛楚备尝，迫建伪国，欲速我亡。堂堂华族，神明之胄，守土有责，宁容倭寇？聚五不才，速随隽秀，受民之托，暂充领袖，百二山河，誓谋光复。受命之初，战战兢兢，爰集我族，爰呼我朋，秣马厉戈，争为先登。蠲除私见，共效英能，希我民众，乘时而兴。犁庭扫穴，痛涤妖氛，还我旧物，安我同群。凡属良善，中外爰分，一体爱护，保卫须殷。谆谆拳拳，誓诫吾军。法罚罪暴，爵劝有功.勿论亲疏.惩赉心同。同寅僚属，与乘大公，既属一体，声气必通，同心同德，贯彻始终。天地神祇，总理之灵，虔诚盟誓，敬邀钧听。

黄河如带，泰山如砺，石烂海枯，不渝此誓，凡我同志，永守勿替！”

读罢，即率全体将士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向军旗行三鞠躬礼。

接着，王育文致开会词，富光圭、孟伯钧、唐玉振、唐聚五、张宗周等相继演说。大意是：日寇陷我山河，亡国之祸即在目前，故此兴兵讨伐，争我人格，还我土地，复我政权，取我自由；希同胞协助，早日庆功，等等。句句慷慨激昂，亦颇警醒，动人听闻。说到沉痛处，声泪俱下，全场大为感动，皆唏嘘流涕，哭声一片。当唐聚五演说到“……天下最痛心者莫过于亡国。日寇强占我东三省，生灵倍遭涂炭，凡有民族气节者，怎能容敌猖獗！今日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就是肩负光复祖国河山的重任，毁家纾难，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地决不罢休”时，话语激愤，怒目圆睁，取佩刀割破右手中指，血书“救国爱民，杀敌讨逆”八个大字于白绢上，下署“唐聚五”。与会者为之激励万分，无不斗志昂扬，高呼“打倒日本”、“打倒伪国”、“还我山河”等口

号。

接下各县代表演说，自卫军各路代表演说，各机关代表演说，士兵代表演说，学生代表演说，民众代表演说。个个严词厉句，义愤填膺。演说完毕，呼罢口号，摄影留念。

大会结束，军民排队示威游行。唐聚五骑黄骠大马走在队伍前头，民众与学生们随走随呼："今日重见青天白日国旗，从此不做亡国奴啦！"人人喜形于色，欢跃行进。夜里，县城灯火久不闭熄，人们更深不眠。

（三）

誓师会后，唐聚五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昊天不吊，倭贼内犯，焚杀淫掠，横肆蹂躏，数月之间，几无宁日。且复威胁溥仪，建造伪国，强迫民意，勒令服从，以灭朝鲜之故伎，重施于我。凡有人心者，谁不共愤！聚五等分属国民，已应守土；职为军人，尤须杀敌，今而不起，更待何时？况荷国家之重任，受民众之委托，大义所在，万难袖手。今择于四月二十一日，爰整所部，与民众联合，共同一致，起而讨

逆。国难当前，人必奋勇；仇不戴天，誓必歼灭。渴饮敌血，饥餐虏肉，前者扑后者继，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光武一人，尚能中兴；楚余三户，终亡秦国。我东北民众三千万，人具救国之心，士怀杀敌之志，痛饮黄龙，指日可希，还我山河，克期而待……”

同时张贴第一号安民和第二号军法布告。内容是唤起民众杀敌讨逆热情；对破坏军纪而影响抗日者惩处。

唐聚五还电令桓仁、通化、宽甸、新宾、长白、抚松、集安、临江、安图、金川、柳河、岫岩、庄河十四县一体改旗反正：

“倭寇逞凶，关城皆毁，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本总司令承国家之委托，受民众之推戴，已于本日就职誓师。仰于电到时，即改悬青白旗反正。”

并派人沿街以至乡村粘贴各种图画及文字标语，散发告民众书。文曰：

“……总而言之，我东北民众已气愤填膺，忍无可忍。我全军将士，终朝饮泣，午夜彷徨，久具杀敌救国之决心，一息尚存，誓必奋斗。为世界保和平，

为我国谋生存，为民众御外侮，为将来谋幸福，定必灭此朝食，还我山河。”

又邮寄各处告武装同志书，旨在劝教伪国将士倒戈反正，并按贡献大小赏典论功。结尾语重心长地说：“亲爱的同胞们，千万不要瞻前顾后地坐误良机，给外人作刽子手，同胞杀同胞，实为天下最残忍的事。不但为万国所鄙笑，也教同胞听切齿，就是倭奴，也未尝不白眼相看牛马相对呀！亲爱的同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我们个人生死的界线。要认清了仇敌，认清了家人，谁无心肝？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倒戈反正，翻然归来，这是你们顾念大义，杀里逃生的机会，尤其是我们武装同胞所欢迎的事。同胞们，我亲爱的武装同胞们呀，响应响应，归来归来！”

同时，向国联调查团发出《呼吁书》，要求他们：“一秉大公，迅速调查，转报国联，以明是非而保和平。不然暴日之毒焰日张，大陆政策一成，今扰东省，明将侵及东亚，而指顾间，欧美大陆也难幸免，世界第二次大战，即迫眉睫矣。故劫今对于非徒

我国之所愿，亦世界之所同庆也。敝军虽只十万，然人心思汉，有增无减，纵余一枪一卒亦必奋斗到底，万不能屈服于暴日之下。”

从此，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从桓仁这块发祥地上不断发展壮大，整个辽东地区抗日烽火熊熊，斗争浪潮风起云涌，势可不挡。



“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东北而制造的阴谋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攻占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尔后沈阳沦陷。同时，向吉林，黑龙江发动进攻。当时，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撤退到山海关以南，仅三个月，就轻易占领了东北。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

我参加自卫军后方医院的一段经历

张凤浦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沈阳事变”。当时，我正在亲戚家串门。几天后我与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史精乙（四道河子人）搭伴返桓。因交通不便，步行六、七天才到家。回桓仁后，仍在同升医院就医，并将“沈阳事变”情况介绍给乡亲们，大家对日寇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无不愤恨。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天下小雨。刚吃过晚饭，从大街西头走过来一排穿着整齐的士兵，大街各胡同口都站上了岗哨（静街），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渐渐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我提着灯笼，刚走到十字街口（现在的农贸市场头），岗哨问我干什么？我说去接开会的袁老爷（袁璞忱）。哨兵不让我走大街，我便从二道街绕到城隍庙东厢房等着他们散会后才回家。从袁璞忱口中得知：这天晚上

的会议，是唐聚五根据 .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派秘书黄宇宙带来的救国会和张学良的密信要求而召开的秘密集会。到会的有县长刘静达、公安局长张宗周、县大队长郭景珊、第一区长赵德恩、农务会长孙玉山、商务会长宫方廷、教育局长孟作忱、电话局长邱汗章、师范校长李景南以及士绅袁璞忱和金聚廷等。在会上，一致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公推唐聚五为总司令。会后，各路抗日队伍领导人都加紧进行组织准备工作。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在桓仁县师范学校操场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誓师大会。会上，唐聚五发表了就职演说。自此，东边道地区人民群众反日斗争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当时桓仁县大队，改为“第七路民众自卫军”，司令为郭景珊。在桓仁各族各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影响下，我们同升医院三名医务人员参加了第七路医务处。刘同升为上校处长，我和肖永才为中尉军医，跟随司令部活动。

"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后方医院，原设在通化，人员少力量薄弱。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将后方医院转来桓仁，医务处设在魏珍饭馆楼上，院部设在南关中学院内。为了充实力量，从第七路军医处抽调了几名军医到后方医院，院长是总司令部医务处长刘同升兼任，医疗股长姜汝舟，司药官张仁山，还有军医等共三十多人。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六日，驻扎在安东的伪军鸭绿江"剿匪"司令姜全我和安凤地区"剿匪"司令徐文海率领八百多兵，进攻牛毛坞，后又攻打砍川岭，双方伤亡严重。我方轻重伤员入院七十多人，伤势重的十几个人，因医疗条件差抢救不了死亡三人，有的不得不截肢，轻伤员经过治疗逐渐出院。其他各处的伤病员也送往后方医院治疗。

那时交通不便，运输多是人背、牲口驮，加上敌人围困封锁，医药卫生材料都很缺乏，给医疗带来很大困难。为伤员换药时没有绷带，就用白花其布代替，没有白花其布，就用花洋布作绷带。没有药水洗伤口，就用盐水冲洗。较重的伤员有的伤口化脓，盐水

洗伤口疼痛难忍.我们医生也很难受,只好安慰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不仅医药缺乏，饮食也跟不上，伤员吃的多是高粮米和包米碴子饭，大米白面很少见，做菜多是用白水煮加点盐。有时断盐，还得派人到朝鲜那边去往回背，一个人只能背四、五十斤还累得够呛。但是无论生活怎样困难，大家都能设法克服，只有一个念头——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记得有一次，唐聚五总司令从通化坐汽车来桓仁视察时，还专门到后方医院慰问伤员。唐总司令到医院后，先给我们医务人员讲了形势任务，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给伤员治疗，讲了很多。然后进屋里一一和伤员握手慰问，伤员们都十分高兴，说说笑笑很亲热。最后，唐总司令拿出一千元钱慰问伤员。大家都十分感动，表示要早日痊愈，参加抗日斗争。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日本侵略势力调动几万日伪军向东边道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十月十三日，我正在给伤员换药，有人来医院送信，信中说："敌人已从永陵打到桓仁送界的老道沟岭，准备撤退"。十月十四日，后方医院接到命令，要撤退到抚松。当

即对伤员作疏散处理，能回家的回家，有亲友的投亲友。第二天（十五日）天不亮，我们就赶着大车拉着药品奔东路走了。到横道川九点多钟才吃早饭，还没等休息，敌人就围上来了。情况十分紧急，只好命令解散，各奔他乡了。我走了一下午，天黑以后才回到家。此后，我同后方医院断了联系。





张 庆 玉

辽宁民众自卫军上校团长张庆玉轶事

李永勋 供稿

一九八三年春，桓仁县五旬子镇老黑山小学退休教师张慎明同志向国家献出他父亲张庆玉的遗物四件：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副司令部任命状；上校军阶领章；军用关东洲地图和当年用过的旧皮手套。还有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致老根据地人民的信》和带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纪念章。这些珍贵实物被上级党史征集部门征用收藏。

张庆玉（一八九〇——一九四九）系桓仁县普乐堡人。幼时读过私塾、为人慈善，信奉佛教，好习武功。他食不动荤，不灭生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势力，悍然武装侵占沈阳，继而全线出动迅速占领了长春、鞍山、抚顺大中城市，消息迅速传到了全国。身居偏僻山村的张庆玉，闻讯后，昼不进食、夜不能眠。他为国危

亡而忧，为民受辱而愤，加紧练功，准备为国效忠。恰逢东北军驻桓仁团长唐聚五、公安局长张宗周、公安大队长郭景珊等爱国志士在桓仁树旗抗日，决意保国，号召民众同舟共济共同杀敌讨逆，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时机。他毅然参加了该军第五路军。当时枪支、装备都十分困难。他头扎红绫布，身背大片刀，手持红缨枪，好不威武飒爽。

该队驻守在桓仁、宽甸交界地砍川岭。此岭系辽东交通要隘，岭高千米，地势险要，守军在岭上掘壕筑垒，上盖秸草遮风挡雨，下砌火炕驱潮御寒，日夜驻守岭上，看守着桓仁的南大门。

一九三二年春，自卫军刚刚组建不久，总司令唐聚五命第五路军攻打驻牛毛坞的汉奸于芷山部。经两天一夜的激战，歼敌八十一人，夺回了这一军事重镇。

是年六月，于芷山叛徒不甘心失败，勾结大批日军又占据了牛毛坞，继而大举进攻桓宽交界地——砍川岭。自卫军凭借地理优势，埋伏于路边树丛中隐蔽截击。敌伪汽车缓慢小心地边放枪边前进，当进入埋伏圈内时，自卫军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杀”声震

天。张庆玉等大刀会成员，赤膊上阵，挥午大刀长矛，冲向日伪军，展开了肉搏战。不多时，就杀伤日伪军一百多，烧毁军车两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八月一天下午，鬼子讨伐队组织三百多兵力，在天上有飞机，地上有汽车、马队配合下，东西两路向砍川岭上的守军夹攻。自卫军在岭上与敌对峙了数小时后， 利用夜幕降临好时机， 机智而迅速地撤出阵地。而两股鬼子兵猛烈地向山上边射击、边进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互相开枪对杀近三个小时。敌人用军号联络，方知上当。日本指挥官大佐太郎垂头丧气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啦、哇啦”直叫骂。

这三仗，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使日伪军锐气大挫。他们对大刀会成员不惧枪弹英勇拼搏精神迷惑不解，认为大刀会是枪刀不入的“天兵”，出没无常的“神将”。

张庆玉在这三次战斗中发挥了他的才能和武功，表现了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副总司令张宗周签发委任状，任命张庆玉为该部卫队武术第一团上校团长。

是年冬季，日伪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辽东抗日

军民实行残酷"讨伐"，调集了三个旅团及在辽宁的大部日伪军，对辽东地区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在此严峻局势下，因敌我力量悬殊，自卫军难以继续坚持战斗。根据唐总司令的决定，各部分别行动，能将队伍带至热河者，尽量带往热河；愿在当地坚持者可就地坚持；不能坚持的可就地遣散。张庆玉团长并不气馁，去吉林一带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

一九四一年，张庆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乡。在普乐堡老漫子村以开香磨为业，掩护自己，直至"九·三"光复。

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以他家有山地十多亩出租，又开香磨雇工剥削，被牛毛沟村农会捕去，准备开群众大会斗争。当时，张庆玉老伴丛淑清急中生智，想起了经她精心密藏的东西可能有用，随将瓷坛挖出，取出张庆玉的任命状等物件，到区政府找到了区长衣凤岐，说明了情况，要求留命。衣区长急忙赶到会场，向广大贫雇农群众说："张庆玉是抗日战士，有功之臣，不能斗，要斗争他，就对不起共产党啦！"这一说明，在场的土改工作队和群众都表示谅

解，就一致同意释放他回家了。

一九五一年秋，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达桓仁。张庆玉虽已病故，当地区政府推荐其子张慎明，代表老红军家属到县参加了座谈会。会上中央访问团赠送给张慎明“毛主席纪念章”一枚，以示关怀留念。



大 刀 会

清代民间秘密团体之一。系白连教支派。会内主要有坎门和离门两支：离门为烧香念咒，不动刀枪；坎门除念咒外，还练习排刀、排枪和排砖等武功，设立坛场，传授徒弟。大刀会是早期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前驱之一。曾发动反抗封建压迫和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也曾被封建势力利用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大刀会纷纷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学生奋起逐李鬼

于发中　供稿

五十七年前，在我们桓仁县，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学生抗日运动。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全面侵华的需要，开始在中国各省，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各县设立领事馆。在桓居住的日本人，也大肆兜售日货，筹措资金，极力为设立日本驻桓领事馆而奔走。耳闻目睹这种侵略行径，桓仁县城各中等学校的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

这时，桓仁县师范和初中的校友会首先接到凤城县师范学校校友会关于联合反对设领的传单。紧接着，各校又陆续收到东北大学、冯佣大学以及外地各中等学校的有关呼吁救国、反对设领的通知。兄弟学校的呼吁和声援，进一步激发了县师范、初中、职业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等六百多名同学的民族正义感，并在当时县师范、初中的学监张海春（字景涛）的暗

中支持和领导下，决定一致行动起来，抗日救国。

经过充分酝酿和周密安排，一场由县城各中等学校校友会出面组织的桓仁学生抗日运动，终于在同年的五月间爆发了！

这天，桓仁县各中等学校集合学生四五百之众，排成整齐的长队，从南关的师范和初中的校址出发，来到东关，经过十字街，又至西门脸，一路上，同学们不断的举起紧握着的拳头，“坚决反对日本来中国设立领事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抵制日货！购用国货！”等响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在桓仁上空。

这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轰动了整个县城。县内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市民，对此义举无不拍手称快。

驻通化日本领事馆闻讯，十分震惊，指令一个在桓仁开洋行的日本人长谷川（外号叫李鬼）抓紧活动，强行设立领事馆。李鬼根据上司的要求，公开勾结县城东关的关某，并以小洋钱六百元租妥关某的瓦房五间，还明目张胆地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消息传

到南关，师范和中学又出动了一百多名学生，手持锹，肩荷镐，一边喊着“反对日本在桓仁设立领事馆！抵制日货！”的口号，一边直奔东关，要将关某租给日本的瓦房拆毁。关某见状，吓得面无人色，跪在地上讨饶：“我保证不租给日本人房子了！你们千万别拆。”并表示坚决辞退不租，学生们这才收起锹镐，领事馆也就因此没有设成。

事后，学生们为了教训日本人，还喊出口号，要捣毁李鬼的洋行。李鬼得知，跑到县政府恳求保证他的安全。当时的县政府和教育局，考虑学生的反日热血和勇气越来越足，害怕由此再引起国际事件，便召集各学校校长研究，决定提前于五月下旬开始放暑假，这才把这次学生抗日运动平息下来。

这次为时不久的学生运动，成功地阻止了日本驻桓领事馆的设立，伸张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正气，虽被有关当局平息，但这些学生的光荣业绩和凛然壮举，仍将载入桓仁县的革命斗争史册，作为永恒的可引为骄傲和自豪的印记，留在桓仁人民后世子孙的心中。

桓仁朝鲜族反抗“同乡会”的一次斗争

金钟　供稿

桓仁县的朝鲜族群众，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九月中旬，组织了全县朝鲜族青壮年近千人的集会，与“朝鲜人同乡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了朝鲜族人民团结反日的民族精神。

所谓“同乡会”，是日本侵略者网罗少数朝鲜族二鬼子为其服务的反动组织。当时，桓仁没有日本领事馆。是由通化日本领事馆通过“朝鲜人同乡会”对桓仁县的朝鲜族人进行统治。这个反动组织为了刮集经费，非法规定每年向桓仁的朝鲜族每户强把收十五元的捐款。如有违抗拒缴者，就要遭到毒打或定罪坐牢。一九二九年七月收款时正是青黄不接季节，许多农户因无钱交款而遭受摧残，有近百人被逮捕。北甸子英英沟村的一位朝鲜人，因交不起款竟被“同乡会”的吴景珠、边吕竹和李累点给活活打死了。消息传开

之后，激怒了全县的广大朝鲜族群众，一场反捐反日的斗争，在酝酿中。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群众就有首领。朝鲜族爱国组织负责人鲜于桂花(又名鲜于雄，二户来人)、李东民(华尖子人)、金贞善等人，首先在桓仁城内朝鲜族咸贵润家开会，研究了反抗“同乡会”的行动计划。然后，他们分头发动组织全县朝鲜族群众。按照计划，全县近千名朝鲜族青壮年，于九月十五日集合在六道河子、东老台和北边石哈达、泡子沿一带，准备进城向民国县公署请愿，要求惩办杀人凶手，保护朝鲜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消息被反动的“同乡会”头子宋云逢（朝鲜族）得知后，即向公安局长和县公署报了信。县公署怕出乱子，便下令撤回北江沿的渡船，以阻止朝鲜族群众过江进城。但近千名朝鲜族青壮年毫无气馁，在韩龙俊等人带领下，转由西江沿涉水过江。这时，县公署急忙派了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骑马赶到西江沿，围住过江的朝鲜族群众，并提出派五名代表到县公署谈判、其余的过江回六道河子等待的要求。此时群众中站出了几十人争先

恐后的要当代表，最后经商定选出十八名代表进城谈判，余者全部回到六道河子等待消息，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当天晚间得到初步谈判消息，县公署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部分意见，关押了杀人犯边昌竹和李累点。但以后到十九日得到消息说，通化日本领事馆派日本人警察近滕真藏和朝鲜族警察文永善等四人来桓，同县公署交涉后，不仅释放了两名杀人罪犯，而且关押了十八名群众代表，还将于二十四日把代表全部押送去通化。朝鲜族群众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并认识到靠软弱的县公署是没有希望的，便决定用自己的力量，设法营救十八名代表。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朝鲜族群众密布于北江渡口至泡子沿一带(去通化必经之路)，准备解救自己的代表。当通化日本领事馆派来的四人和本县三十余名警察，用两辆马车押送十八名代表，渡过北江下了船以后，群众便蜂拥而上，抢救代表。文永善为首的警察们见状惊恐万分，立即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瞬间，枪声、呼喊声大作，混成一片，警察狗腿子们边

放枪边夺路而逃，群众则拦堵抢救代表，一直追出数里才算罢休。结果，除李东民、金贞善两位主要代表外，其余十六名代表全部救出。而群众却有十八人被打伤，两人（雅河群众李命九、徐相浩）被打死。这次桓仁朝鲜族千人集会反抗“同乡会”的斗争，虽遭镇压而结束，但充分显示了广大朝鲜族群众团结一致，反日反捐的勇敢精神。后来听说，朝鲜独立革命军司令梁瑞凤也为这一事件而感慨，派中队长张道白到通化，暗杀了罪犯文永善。通化日本领事馆还把这一事件，当成重要内容向日本外务大臣写了专题报告。

这一流血事件，教育了群众，更加激起广大朝鲜族人民对日本侵略势力及其走狗的愤恨，为后来的抗日斗争播下了种子……。

富尔江惨案

李世信　供稿

自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唐聚五在桓仁树起抗日大旗，组建抗日民众自卫军，至同年十月中旬撤退蒙江，大部分将士跟随北上；部分解甲归田，还有一部分化整为零上山继续坚持抗日活动。后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独立师挺进桓仁山区，先后将分散的各武装组织进行了收编，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拖住日寇向我国关内的进犯。

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侵略战果，必须消除后顾之忧，于是一面凶狠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大肆并屯，断绝广大人民群众与抗联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地四处派遣汉奸走狗，对我抗联部队和部分“土匪”百般引诱，进行“收降”。一九三七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日寇下令让被骗“收降”人员到县城领取“证明书”。当时有侄儿代替叔父、弟弟代替兄长、内弟代替姐丈前往领证的。至正月十三日将去桓仁镇领取“证明书”的抗日志士、无辜百姓全部上了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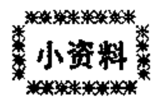
绳用汽车拉到西江岸杀死后填进冰窟窿里去。（其中还有被诬陷者，如现拐磨子镇双岭子村付玉清之父付文库，就是被伪警察官报私仇而填江的。）

拐磨子警察署长朱文元奉行日本小林指导官的旨意，率领伪警察和保甲兵，将在全拐磨子（包括现在的业主沟乡、新宾县的响水河子等地）被“收降”的十七人抓了起来，押在拐磨子警察署拘留所。

在桓仁镇西江惨案的当天上午，拐磨子古城子警察分驻所所长孔昭明，抓了好几十名农民，在西古城子富尔江的老黑砬子江面上砍的冰窟窿。在当天下午一时许，分驻所长孔昭明又下戒严令，全屯任何人不准出屋。在二时左右，日本小林指导官、庄巡官、潘警长等带领日本兵、警察、保甲兵，押着用绳子五花大绑的十六个人（死在拐磨子拘留所一人），带到富尔江老黑砬子江上冰窟窿边，开枪击毙，然后填进冰窟窿里。但因人多冰窟窿少而小，填不下就扔在冰上。傍黑天时，庄巡官又命保甲兵再去刑场将被枪杀人的衣服、鞋帽全部扒光，并下令不准收尸。一个个光着身子，尸横江上，鲜血染红冰面，惨不忍睹。

半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农历二月初的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又由庄巡官等伪警察、保甲兵押解七个人，从拐磨子街带到西古城子富尔江现在大桥下的哨口（当时哨口解了冻），将这七个人推进江中，淹死而顺着江水流去。

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中华，对我国人民残酷杀害，血腥镇压，惨绝人寰，罪恶滔天。



伪 满 洲 国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满洲国”，扶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国号为“大同”。一九三四年三月实行帝制，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国号改为“康德”。它是日寇一手操纵的傀儡政权，我国人民从来不承认，故称“伪满洲国”。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它亦随即垮台。

疤　痕

——在当劳工的岁月里

邵　文　津

每当我洗脚的时候，对左脚背上那条近六公分长的疤痕，总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那心酸的往事，无限的愤恨，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每当我望见那巍然屹立在牤牛哨上的桓仁发电厂拦江大坝，总是悲喜交加。喜的是这座雄伟壮观的大坝是我国自己设计、修建、安装，采用新工艺建成的第一座发电厂。悲的是，我是昔日在这当“劳工”时，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险些丧命的幸存者。

每当我看到桓仁镇刘家沟村南面那六栋旧房框，想起那痛苦难熬的岁月和非人的生活情景，悲愤的怒火，常常不能消逝……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们桓仁县这大好河山。那时东北三省已经变成“满洲国”，从上到下，各个组织机构里都安插日本

人执政，处处事事都由日本人主宰。日寇不仅掠夺我国的经济资源，还要强迫中国人无偿地为他们做劳工。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伪满洲国颁布了一个“劳工法”。凡年满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性国民，都是当劳工的对象。县公署（政府）里的行政科，下设有劳务、兵役、动员等若干个股。街（村）公所中设有行政系，分管国兵、劳工等任务。各村公所每年要按县下达的劳工摊派任务数，再按户分派。有钱有势的家，想法逃避或雇人顶替。所以每年都到处抓劳工，实际出劳工的又都是穷苦人。

痛别双亲

我从小家境贫寒，虽只有父母和我三口人，但因没钱难以求学。在我十五岁那年（一九四四年），为了活命和减轻二老的负担，只好被人雇佣去当劳工。俗话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是在那个岁月里，替有钱人去当劳工，就得用人家的姓名，尽管自己难以忍受，又有啥法呢？无耐，就在四月下旬的一场春雨过后的第二天，肩着补丁落补丁的小破被，离别双亲，走出家门。二老送我到村头，千言万语难

出口，那真是一步六行泪、七步十回头，百感交集向前走，心中牢记日寇仇。

“劳工”是个简称，全名叫“劳动报国队”。那年要的劳工，都到“水电局”——佐滕株式会社桓仁水电局去干活。共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四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到四个班，每个班二十人左右。我被编在第四中队第四小队第二班。我们中队的第一个中队长叫刘天泉，这个人还算有点中国人的骨气。劳工每天进入工地在干活之前，由大工头日本退役军官本下武夫的手下人，进行点工。我们这个中队点工的是个中国人姓赵，不知和刘队长有了什么磨擦，一天在我们收工回队时，刘天泉双手叉腰，气势凶凶地喊道：劳工们，把赵点工员给我绑上揍！劳工们对那些奴颜卑膝的人，早就恨之入骨，闻声便蜂拥而上，有人找了根草绳子，将赵点工员五花大绑地捆在电线杆子上，你一拳，他一脚，左一个嘴巴子，又一记耳光，打得他鼻青眼肿，而后劳工们一轰而散。此举解了大伙心头之恨，也为刘队长泄了私愤，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麻烦。第二天，本下武夫在我们中队门前高声

叫骂了一顿，又派来了专人调查。问谁也不承认，谁也不往外递谁，弄了七、八天也没个头绪，最后把刘队长弄到县城，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后来又换了吴中队长。

住 劳 工 房

劳工们的住处，就是现在桓仁镇刘家沟村南边那六栋水泥墙壁的筒子房。两头有门，窗户很小，木头板子钉的床铺。屋里阴暗潮湿，因为身下太湿无法睡觉，只好坐着打瞌睡。特别夏季晚间起夜时就得把裤子搭到大腿跟，不然跳蚤爬满裤腿，一夜就别想睡觉。并且每半月二十天还得轮一回值夜班站岗。白天干活累得够呛，加上晚间睡不好，有的拉肚子，有的长疥疮，还无药治疗。

吃 橡 子 面

刚去头一个月，还能吃点高粱米或“飞机牌”的苞米 子。后来净是吃杂合面、橡子面，每顿饭是两个窝窝头，一大碗白水清汤，天天顿顿如此。橡子面又苦又涩，很难咽下，为了活着就得往下吞，吃下后，每次大便不但干燥而且带小白虫子。由于吃不好

吃不饱，加上活计重，干起活来眼前冒金星，走道都打晃。有不少人闹痢疾、患黄胆性肝炎、得了浮肿，一个个瘦骨嶙峋，把人折磨得死不了活不成，干遭罪。

干 牛 马 活

刚去头一个月，我们这班是卸洋灰（水泥），每袋近五十公斤，卸下后还得摞垛。我的年令小，体质弱，干一天累得受不了。嗓子呛的难受，鼻孔、耳朵眼都灌满了灰。特别是后脖颈子，一出汗，火辣辣的疼，有时扛破袋子撒了水泥，还得挨管库的"二鬼子"和班长一顿棒揍。劳工们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心是相通的。他们看我累得不过眼，明里不敢吱声，可是暗中护着我。有的人故意将水泥袋子蹬破，有的猛劲摔破，有的人把袋口线拆掉使水泥淌出。这样一来，一是延长了卸车时间可以喘喘气；二是用破水泥袋纸当帽子或披肩挡挡水泥灰；再就是得有人扫落地灰重新装袋。大伙指着我对班长说：这活叫小孩干吧。班长无奈只好让我干，再不用扛袋子了。我内心里感激大伙的照顾，每当卸完车休息时，便拿起扫帚轮着给大伙扫身上的水泥灰尘。后来，四个中队的劳工，除

有两个小队专门为西山顶上日本街挖沟安装自来水管道外，其余的全部到坝区围堰内干活。在整个坝区干活的除了劳工，还有“勤劳俸仕”（国兵漏）。勤劳俸仕中不单有桓仁县的，还有通化、柳河等县的。另外还有从山东、河北等地招来的苦力和从抚顺煤矿跑来的“浮导工人”等。进入坝区干活要经过两道卡子（都是白俄持枪站岗），上下班要接受盘查和搜身，进入工地要点名之后才能干活。我们这个小队是分派在右岸的大砬子根下，清理放完炮崩下来的石头；第三小队负责清渣、用水管子冲洗整平的岩石面，以铺绑钢筋浇筑水泥座大坝的基础；被招来的那些人多数是推轱辘马车往围堰外运废沙石；勤劳俸仕队员都在围堰内往外清坝基和合水泥灌坝基。

受尽磨难

凡是在这干活的苦力，几乎是天天挨骂，随时挨打。那些小队长、班长还差些，就是那些“二鬼子”（都是朝鲜人），简直没有抗，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甚至你正在干着活，也不知为什么就被踢一脚或被打一记耳光子。“库拉”、“巴嘎”、“巴嘎呀路”（混

蛋小子）、“哈牙库呀力马斯”（快干）……的谩骂声和嚎叫声整天绕在耳边。当二鬼子喊：“雅斯密”（休息）时，有的人不懂日本话，仍然在那干活，不是被抽一棍子，就是后脊梁挨一石头，多干了活还要挨打骂。对一些工具如“瞎信路”——铁锹，“消路巴西”——尖镐，“拔路”——钉起子，“卡够”——筐等，听不懂不会说，都得挨揍。这亡国奴的滋味，实在难以忍受。

忍 无 可 忍

劳工们受尽了窝囊气，日子久了总想出口气。施工到了六月中旬，天气炎热，“二鬼子”们用水泥袋子和草袋子铺在大石头缝中躺着或坐着歇阴凉。劳工们看着生气，有时偷着把草袋子揭开拉泼屎、撒泼尿，再就用水浇湿，把二鬼子气得直嘟嚷。有一天，三小队的人脱光膀子，用本管子的水互相洗头冲身，没注意喷到一个“二鬼子”身上。这家伙火了，冲上去夺过水管子猛向劳工们喷去。因为全管开放压力大，有的被冲个腚蹲，有的被冲倒爬在地上，有的跟头把式的躲闪。正在这时，柳河县的勤劳俸仕队扛着

锹镐路过，他们目不忍睹，没说分晓，冲上前去，一顿锹镐把那“二鬼子”劈个脑浆崩裂，倒在地下一动不动了。勤劳俸仕们一轰而散，向坝内跑去。劳工们傻了眼，谁又不敢离去。这时站岗的白俄鸣枪报信，不多时来了两汽车荷枪实弹的日本人，把全小队的劳工绑上汽车，押到桓仁街的大监狱里。不知他们受过多少审问毒打，受了多少刑罚，都咬紧牙关不招供。衙门里没弄出头绪，没法押了四十多天全部放了回来。可是这二十多人被折磨的没个人样了，一个个面无血色，头发挺长，胡子拉茬，有的生了疥疮挠的流浓淌血，有的一瘸一拐的走路。尽管这样，回工棚子后只准歇息一天，第三天就逼着带病上工地去干活。

巧 磨 洋 工

刚去的时候，干一天活累得腰酸腿疼，饿的头晕眼花心发闹。自从打死“二鬼子”工头后，管工的也稍微松了些。加上看那些勤劳俸仕们干活镐举挺高，落下来刨不大点个小坑，有的故意将锹镐把别断，有的将土筐子用石头砸碎，他们还编顺口溜说：“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半点钟”。日子长了，劳工们

也学会磨洋工了，不但敢有意损坏工具再去领新的，而且有的还把装好的炮偷着拽出来扔掉，再不就是不装炮胆只插导火索于炮眼中放哑炮，崩不下或少崩下石头就能少干活。

险 些 丧 命

一九四四年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班长令我到山顶上岩石洞里去取粘炮药，以便装炮崩砬子。一箱子炮药是一百支、约六十多斤重。是由山上往下走，小道崎岖，身上负重，腿触得厉害，加上腹内少食，身上无力，当我肩扛一箱炮药走到我们小队干活的砬子边时，只觉得头晕目眩，腿软身轻，恍忽间从五米多高的砬子顶上栽了下去。当我苏醒过来时，只见一位陌生青年，正在用他的腰带给我勒腿，并抻拉胳膊腿，晃扭脖颈子。他说：你看多险，幸亏摔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堆草袋子上，偏一点落到乱石头上，就没命了。我摸摸全身，觉得无损伤，只是左脚背被石刃割开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那位青年正想送我去医院，这时劳工们发现他不是劳工队的人，大伙谢绝后用抬石头的石挂子把我抬到医院。经检查筋也受了

伤，上药包扎后抬回劳工房子。仅休息三天，就逼着我一瘸一拐地去上班干活。我内心非常感激那位非亲非故青年的帮助，想找到他表示谢意。我坝里坝外整整找了五天，总算找到了他。此人的个儿高我一头，长我三岁，山东海阳县人。开始他说姓国，后来他偷偷告诉我：他是被日本鬼子抓到千金寨（抚顺）强迫下洞子挖煤的，是从抚顺跑出来的，原名叫李志国，改名国志礼。并说：咱们是中国人，满洲国不能太长了，你没听说"日本话不用学，再住二年用不着"吗？从此我俩交上了朋友。但是别后再没见到他，我常常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何方！

当劳工苦衷难言。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在整个本电局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有的饥饿而死，有的被水淹死，有的被放炮的飞石砸死……。有一天下大雨，劳工的第三中队第二小队，小队长姓刘（外号叫老太平）让这个小队的劳工去装运钢轨。因为汽车前头搭的短，加上道路泥泞坑洼不平，汽车一歪，钢轨下落，四名劳工队员当时砸死三个，一个受重伤。至于因医疗卫生条件差，得瘟疫病死的人也不少。

日本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二鬼子捧洋屁狐假虎威。他们不但随便打骂，在肉体上摧残劳工，而且在经济上也千方百计地敲骨吸髓。有的设赌抽红，有的画一张像阴阳八卦似的大圆图，格中写着一元复始、二门进宝、三阳开泰、四路进财等无数方格，让你花两元钱押一个格，说是押正了得一块东洋手表。哪知他们提前把能押着的那个格告诉了他们的心腹人，横格揭晓后，得表者又偷偷把表送还原主，设图者一下子干得二百多元绵羊票（满洲钱一百元票背面有一群绵羊）。他们欺骗劳工钱的办法很多。如每天发给劳工一角钱的出勤津贴，可是钱到手还没等热乎，那边就喊：过来过来！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都得买爱国储蓄，每个人三元。发的几个钱，又全部给刮擦去了。

回忆我在当劳工的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仅身心遭到摧残，而且两次更名改姓。第一年代替张洪生，第二年顶替曹忠山的姓名。一直到“八·一五”祖国光复前夕，我才脱离了劳工的苦难生活，自由地回到家中。但当劳工时我受的苦难和留下的疤痕，却永远不能忘记。

动荡的六十天

——记日寇投降后桓仁时局片断

白尔杰

一、日寇宣布投降 百投扬眉吐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裕仁签署《停战诏书》，宣布投降。通过无线电台播送了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十四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祖国光复，人民大众盼望的安居乐业的日子到来了。消息传来，桓仁百姓群情振奋，人人扬眉吐气，个个欢欣鼓舞。

我当时在伪协和会任总务班长。八月十四日午夜十二点，在家里从重庆电台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当时心情激动，一夜未睡。

天刚亮，商丰德经理王德成来我家叩门，一进屋就喊：“你知道不，日本投降了！”我们俩个人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流下了喜悦的泪，异口同声地说：“好消息从天而降，这一天总算盼来了！”

随后，我们坐下来，各自谈了一些收听广播的情况。王德成说：“能听到重庆的广播，县城中国人只有咱两家，咱们的收音机是七个管的，能收到短波。”我当即提议到伪县长公馆去，可能他还不知道呢。

我们来到伪县长公馆门前，一看房门是敞开的。我问伪县长太太：县长在不在？她用手一指说：“到后院去了，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快去吧。”我们绕到后院，见伪县长刘清一站在墙头处，不知瞭望什么。我们向他打过招呼，他说：“你们快来看，日本人都集聚在大院里，在那里跪着嚎啕大哭，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告诉伪县长说：“日本投降了。”他愕然地说：“真的！”我说：“是真的。我们俩人听了重庆电台的广播，特意来告诉你。”他当即合掌举起说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回到伪县长的客室，刚坐下来，伪副县长日本人荻原和伪桓仁街副街长久野也走了进来。荻原哭丧着脸说：“我们日本国投降了，无条件的回国了，从今天起将政权交出，桓仁县的事情你们中国人统统的管吧。我代表日本人向县长宣布这个决定。”荻原

又要求伪县长派十名警察，到日本人的住宅区负责保护日眷的人身安全。伪县长答应马上派人去。这次对话.我在场做翻译。荻原二人走后我说："这些年,咱们都是说下句的,受尽了奴才气，今天总算颠倒过来。"

伪县长刘清一当即下令，上午八点在伪县公署召集紧急会议，伪县公署股长以上的伪职人员和各机关、各单位的负责人全部参加，不得缺席。并马上派出警察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参加紧急会议的人很齐，一些没被通知的伪职员，也来到会场要求参加旁听。会议主要研究成立桓仁治安维持会，会后起草了治安维持会章程。

日寇投降,群情振奋.刚刚获得新生的桓仁人民，报昔日被欺压之仇，扬今天解放之威。铅矿工人组织起来向伪矿长要求劳保待遇和分发口粮；水电工人也自发组织起来与敌伪进行斗争。但反动分子仍把持着桓仁的政权和反动武装，人民群众没有靠山，斗争遭到镇压。

二、反动势力嚣张　妄想操纵政局

由于桓仁地处偏远山区，山高岭大，交通不便，

日寇投降后，共产党八路军，一时不能前来接收。县内日方军政人员提前从内部得知主子投降的信息，为不使其大量罪证材料落入中国人民手里，他们一连数日将伪县公署和军警宪政的档案秘密销毁。在此期间，蒋介石从峨嵋山下来要摘桃子，发表了《告东北民众书》，贪抗战胜利之功为己有，令东北各级伪政权静待国民党中央接收。县内的反动势力粉墨登场，大肆活动，妄想操纵桓仁政局，以便国民党接收时，封官加爵。

成立伪维持会。在八月十五日上午的紧急会上，伪县长刘清一提出成立维持会，责成专人起草章程，规定由股长以上的伪官吏参加选举。刘清一要求：伪县公署各科室职员要一律照常上班，服从原领导人的领导；各部位的头目人要一如既往负起责任；伪警察和保安队要坚守岗位。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刘清一召集并主持会议，亲自宣布伪治安维持会的章程，所谓选举产生了"桓仁县治安维持会"。伪县长刘清一担任委员长、会长，我当时是秘书处长。一些伪官吏、地主士绅分别担任副主任委员、警务处长、行政

处长、宣传处长等职。这些要员宣誓就职后，决定冻结原银行存款，派员平息铅矿工人的斗争，为反动势力卖力。

组织励志社。日寇投降后，虽然成立了治安维持会，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伪官吏内部争权夺势，地主土豪妄图占有开拓团扔下的土地，存款户争相提取银行存款，大烟鬼为领不到烟泡也起哄谩骂维持会是汉奸走狗，广大职工群众纷纷起来与汉奸坏蛋进行斗争。为了稳住时局，由伪治安维持会成员出面，联络同乡、同事，秘密组织了一个叫“励志社”的组织，制定章法，要求参加励志社的人共同遵夺，在社会上起示范作用，以免闹事。励志社成员后来发展到三、四十人。

发行《小日报》。为了稳定政局，宣传伪维持会的“功德”，介绍全国各地主要的时事消息，伪县治安维持会创办了《小日报》，报面是八开的，每日发行三十份，发送到全县。《小日报》由伪维持会宣传处长王德成任主编，伪行政科员沈宏儒、伪协和会青少年班长康建章任编辑，伪协和会会计徐士正和伪协和

会庶务江敦民负责印刷发行。

成立国民党县党部。隐藏在维持会伪官吏内部和励志社的成员中的国民党地下党员，这时公开了身份，他们沆瀣一气，要求成立国民党桓仁县党部。这时，国民党中央派出的党务接收大员已到沈阳。于是，励志社派国民党员孙连芳、孟祥符窜进沈阳，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取得联系。他们回县后，传达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罗大愚和国民党安东省委主任委员李光忱关于立即成立县党部的指示，在杨家街聚集全体国民党员，开会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的书记长是王德成，组织科长是孟祥符，宣传科长是韩飞，民运科长是孙连芳。县党部成立后，连续发表宣言、布告，要求全体伪职员，遵依蒋介石旨意，服从县党部指示，照常工作，静待国民党接收。同时，加紧网罗党羽，学习党章党歌，举行入党宣誓，调查日伪机构人员和资产，准备接收政权。

三、八路军挺进桓仁　人民当家作主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即派出大批部队和干部，迅速北上，接管东北。八月三十一日，八路军所属部

队胜利收复山海关，九月七日进驻沈阳。

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驻通化八路军某支队的罗衡政委，在大泉源给桓仁县治安维持会来电话，提出来桓接收，限三日内回话。

八路军开赴桓仁，伪维持会成员慌了手脚，一部分人主张打，一部分主张接，开了两次会也无定论。伪县长刘清一对共产党能否在桓仁站住脚，持怀疑态度，何去何从，一时没有主张。开第三次会的时候，刘清一问我怎么办？我回答说："接是上策。"他说"对呀，接来再说吧。"会议开始后，一部分国民党员和带枪的人，仍坚持反动立场，妄想负隅顽抗，拒绝接收。但经过分析形势，四面八方都是共产党的军队，随时都可以大军压境进入桓仁；再看看国民党的中央军，距桓仁千里之遥，什么时候能来接收桓仁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这样，算统一了认识。

三天后，伪县治安维持会不得不组织伪公署职员、商务界人士及学生、群众，把八路军迎进县城来。饱受日寇践踏的桓仁百姓于祖国光复之后第一次见到

自己的军队。

八路军进城以后，当天下午就进行紧张的接收工作。晚八时，八路军命令伪县长刘清一集合伪县公署各科室及警察大队的要员到伪县长办公室开会。会上，罗衡政委宣讲了抗战后的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号召一切爱国人士要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同时，警告桓仁的一小撮汉奸、地主和反动分子，老老实实地听候共产党处理，不准为非作歹与人民为敌。并下令伪县维持会制定措施，坚守岗位，看管物资，等候民主政府前来接管。

尽管反动势力猖獗一时，把全县搞得乌烟瘴气，但黑夜尽头是曙光，动荡的六十天结束了，人民群众重见天日，桓仁历史翻开了新的光辉的一页。



“治安维持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势力投降后，日伪政权机关已瘫痪，由伪政权人士组成该会。其目的是：维护地方秩序，保持社会安定，处理临时事宜，等待接收。

桓仁知事王济辉举旗讨袁

陈长河　供稿

一九一六年四月底，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但仍恋栈总统职位。以邵兆中、王济辉为首的革命志士，在桓仁高举反袁护国旗帜，称辽东护国军。

（一）

一九一五年秋筹安会出笼，鼓吹帝制。桓仁县知事王济辉，不满袁世凯图谋称帝，与县署承审员文怀亮、总务科长崔文会及当地士绅佟宝泉、李国华等人，密议讨袁之策。同时，王济辉又派其子潜往长江一带，联络当地革命党人。终因环境恶劣，党人难于他顾，无结果而返。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反袁起义爆发。全国纷纷响应，王济辉等决定乘机而起，派人去大连等地暗设机关部，以资联络指挥。

革命党人、原庄河警长邵兆中，也正伺机反袁。王济辉派人与之联络，邵满口赞成。经议定三项办法：一、由邵赴日，向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请示办法；

二、派人分赴各地，策动防警响应；三、编练一支游击队，作为起义主力。邵兆中先后派王振武、颜景明、杨一峰等人，前往榆关、庄河、安东等地，运动该地防警响应。并派人将省库解款提取一部分，送往大连作为购械之用。游击队业经组成，防警亦经联络就绪。起义条件日益具备。决定一经发动，即分水陆两路进兵，一由鸭绿江取安东，一由宽甸夺安东。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济辉等集众誓师，正式宣布桓仁独立高举义旗，一时“三军之士欢声雷动”，革命情绪极其高昂。

桓仁独立后，王济辉忙于指挥军事，县知事一席，暂派李邦藩代理，负责维持日常工作。当下推举邵兆中为辽东讨袁护国军总司令，王济辉为副司令。此时，起义战士，不满百名，枪支也不足百支，力量尚属单薄。为此，两路进兵，难于同时并举，只好选择水上一路。

在宣布独立发动起义的同时，起义军接连发出“组织共和军声罪致讨檄文、”“致各省通电”及“致奉天驻省各国领事照会”等文电，大造革命舆论，对袁氏进行口诛笔伐。此外，又致电奉天将军张作霖，劝

其响应起义，宣布独立；致函第二十八师长冯德麟，请其与起义军一道，“共讨逆贼”。

（二）

起义大军出城后，有不少年幼学生，投奔起义队伍。沿途来投者，亦复络译不绝。四月二十九日，起义队伍抵桓属沙尖子即派佟宝泉等宣布讨袁护国意旨，并张贴“辽东护国军沿途布告”，以安民心。同时，公布“辽东护国军行军纪律”三十一条以严肃军纪。“布告”、“行军纪律”的颁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商会派代表表示欢迎，街上照常营业，毫无惊扰之状。

四月三十日，义军顺江而下，驻于碧潼对岸，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速行退位并传檄各省，与南军一致行动，共同讨伐。由于袁氏拒不答复，义军乃于五月二日起，主动发起三次战斗，一战于宽甸蒲石河，再战于永甸河口，三战于长甸河口。蒲石河之役，击败当地警团，伤其团兵、牌长各一名，俘其巡官一员。四日义军舍舟就陆，拟进攻宽甸。队伍行抵永甸河口，与奉天右路巡防遭遇，战斗颇为剧烈，

结果击毙敌兵三名，击伤六名。擒获哨长一员及士兵八名。七日，义军又向长甸河口发起攻击。经过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击毙敌兵三名，击伤数名，义军战士梁得全也壮烈牺牲。此时，义军收到邵兆中要求暂停战斗的书信，只好取消进攻长甸的计划，暂行退兵。经将枪弹等寄存于韩国新城日本宪兵分遣所。起义队伍，疏散各地，伺机再起。

（三）

起义军停战十余天，又发出“致奉天张将军书”，对张作霖仍未宣布独立表示强烈不满。同时，致书第二十八师长冯德麟，推崇备至，请其联合洮源镇守使吴俊升及东边镇守使马龙潭，以重兵压张去职，然后会师榆关，“进犁贼窟”。经过各同志奔走呼号，数月之间，起义队伍剧增至四千余人。这时，奉省其他各军、革命党人发动的反袁武装斗争，也此起彼伏，方兴未艾。

起义军经过养精蓄锐，正拟联合辽东各县，会师辽沈，适袁世凯忧病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义军奉令，停止战斗。但现有队伍，一时却不易解散，且

筹饷亦甚困难，经与山东义军领导人吴大洲等商定，将辽东护国军并入山东周村护国军。为此，要求分散各地义军，迅速集中于大连，以便遣送，听候改编。同时将“辽东护国军合并之布告”刊登报端，并相应发出归并的通告。辽东护国军印信，亦予以销毁。

应该说，辽东护国军反袁起义，在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反袁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战斗业绩，也为辽宁近代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知　事”

民国初年间，称一县之长官为知事。相当于县长。

据《县志》记载：自宣统三年至民国十三年（1911年—1924年）间，我县共六任知事。王济辉系第三任知事。从民国十三年起，改称县长。

解放前的桓仁工商业

崔宗善　白尔杰　供稿

桓仁地处辽东山区，山高岭大，历来交通不便。解放前从事工商业的人，寥寥无几。民国时期只靠浑江水运，进行商业往来，对发展桓仁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浑江发源于吉林省龙岗山脉，在桓仁县境蜿蜒流经六百余里之后入鸭绿江。当年的从商者，利用这水上航路，每年自清明至霜降，用水船、水伐将桓仁地区的粮食、木材以及土特产品运往安东（今丹东市）出售，并由安东通运货物，繁荣了桓仁市场。浑江两岸的农户，由于江运频繁，直接参与了货币交换，农副土特产品转化为商品。每日傍晚浑江沿岸的村屯，都有停船休息的商人，他们走家串户，与这里的农民进行买卖交易。航路的开辟使造船业应运而生。造船、拉纤，都需要大量工人，农村的一部分劳动力有了就业的机会。据记载，县城和沙尖子两埠，每年制造敞

口帆船约五百余只。桓仁县城和沙尖子是当年两个水路大码头，每到冬季，农民用马车将大豆、粮谷及土特产品运往两地， 商人将其囤积起来， 待到来春开江，再水运至安东。两个码头，桅帆片片，车辆行行，粮仓林立，店家商号鳞次横比，好不热闹。

浑江水运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然而，劳动人民却要受到层层盘剥，既要受地主的剥削，还要受商人的剥削。农民一年到头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交了地主的租子以后，剩余的就不多了。但为了生活用钱，不得不把仅有的一点粮食低价卖掉，甚至要卖“粮窝子”。一些商人乘农民卖“粮窝”的困境，从中压低粮价，谋取暴利，农民在地主、奸商的双层剥削下，困难重重，苦不堪言。一九三五年，浑江上的拉古哨兴建水力发电站，这条航路便被堵塞。

到日伪时期，日伪政权实行统制经济，对物价进行限制，并设经济警察，专门负责监督商品的价格，不准私自经营。因此，工商业产品销路不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浑江航路中断，进货只靠马车，路途遥遥，往返一次日程多达半月之久，一遇雨天拖

延时日，时间就要更长些，耗费大，成本高，工商行业每况愈下。

一九四〇年以后，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节节失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海空军又侵袭珍珠港，并妄想在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激起全世界人民的义愤，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击。因此，日本提出一切为了战争，变本加厉地在本国特别是在东北收刮军需物资。当时伪满政府相继实施了准战时体制，加强物资控制，对粮食实行强迫收购，对其它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工商业景况早已萧条冷落，一蹶不振。当时桓仁县十八万人口，吃不饱，穿不暖，过着亡国奴生活。工商业者大部分在吃老本，还要应付日本人搞的募捐；有的商号资本家或经理，因救国会事件受到株连，更是人心惶惶，苦不堪言。

伪满洲国的工商业者，由商工公会这个组织统辖和管理，负责维护工商业的利益，解决工商业相互之间的纠纷，以及谋求工商业发展之事宜等等。对外，则代表工商业处理各项事务。商工公会的机构组织如

下：

第一任会　长：王子然

副会长：钟树庭

第二任会　长：孙维廉

副会长：李沐波

常务理事：邱星三

商工公会下设三个股：

商工股股长：黄印堂

股员：于凤桐、周信乙

调查股股长：刘维馨

股员：周志镐

总务股长：康谊轩

股员：贺松年

商工公会还设有主事一人，由日本人担任。另外，设有商务会，会长宋作忱，副会长宫芳亭。

伪满时期桓仁的工商业按行业划分，有以下较大商号：

1、杂货行业：

洪兴德　经理：王宣楼

洪兴合　经理：赵子宾

玉丰德　经理：栾昆棠

玉丰和　经理：王敬之

复昌永　经理：王世堂

永聚和　经理：宿星聚

大德全　经理：孙百行

义顺永　经理：陆子钦

怡庆德　经理：卢鼎祥

怡兴德　经理：丛印堂

天昌顺　经理：杨化堂

和顺东　经理：孙维廉

德太恒　经理：方志和

协和太　经理：任砚之

万合顺　经理：吕品一

2、粮米加工业：

产业会社　经理：松山龙俊（朝鲜人）

太德昌精米所　经理：单选三

和顺太　经理：崔岫东

3、文化印刷业：

长兴德　经理：薛乾如

萃丰德　经理：崔润生

天诚信　经理：徐其彦

4、饮食行业：

增裕源饭馆　经理：丁益洲

茂生园饭馆　经理：付耀亭

刘回回馆　　经理：刘景和

5、旅店行业：

郭家旅店　经理：郭景山

康德旅馆　日商经营

姬岛馆　　日商经营

末广旅馆　日商经营

6、医药行业：

自厚生　　经理：王桂东

怡庆堂　　经理：王裕斋

中兴福　　经理：杨中正

永和长　　经理：苏瑞麟

春和长　　经理：于香泉

同升医社　医生：刘同升

汝舟医社　医生：姜汝舟

大林医院　医生：齐大林

龟山医院　医生：龟山一雄（朝鲜人）

公医医院　公医：黄玉璞

7、**酿造行业**：

裕成泉烧锅　经理：宋子合

德泰兴烧锅　在沙尖子镇下甸子村

德兴泉烧锅　在泡子沿

8、**皮革行业**：

德全厚　　经理：张某

全盛太　　经理：陈昌五

刘皮铺　　经理：刘星五

曲皮铺　　经理：曲铭堂

9、**成衣行业**：

李成衣铺　业主：李宝贵

石成衣铺　业主：石俊堂

韩成衣铺　业主：韩兴业

10、**制鞋行业**：

宜长永　　经理：王兆宜

11、**山货行业**：

长发东山货庄　经理：胡秀臣

12、**木器行业**：

德林森木匠铺　经理：任　禄

福林森木匠铺　经理：王德才

13、**薄铁行业**：

迟锡匠铺　业主：迟　某

范锡匠铺　业主：范兆岐

14、**铁匠炉业**：

东盛炉　　经理：于六生

梁家炉　　在西关

于家炉　　在北岭

15、**妓院和酒家**：

满洲馆

升月妓院　（日本人）

梅酒家　　（日本人）

朝鲜料理店

16、**客运行业**：

交通株式会社　经理：梅村益雄（日商）

奉天交通会社　经理：刘介臣

17、**其它行业**：　澡堂、理发馆、点心铺、摊床约二、三十家。

小资料

基　督　教

是世界三大教之一。产生于一世纪初，是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希望寄托于“救世主”能把他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圣经》利用臆造的神话，宣称该教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创立的。

该教创立初遭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后转而采取控制利用政策，竭力加以扶持。到二世纪后期就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宗教，为奴隶主服务的御用工具。中世纪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麻醉人民的精神武器。

该教目前已分裂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天主教元代时传入中国。东正教于一九二七年自沙皇俄国渗入。三派都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用作侵略中国的工具。

桓仁旧金融业的变革

何延年　供稿

桓仁县于一九二四年设金融机构，迄今已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但解放前金融发展状况，由于无资料可查，只能以口为碑了。现根据金融界老同志的回忆，对桓仁金融业各个时期的变革情况略作整理。

（一）

桓仁县位于辽宁东部，山环水抱，资源丰富，但开拓较晚。建治前因系满清开发禁区，列柳条边外，所以，只有少数农民，偷越柳条边界开荒种地。清光绪三年（1877年）桓仁建治以后，定赋兴科，开拓创业，经济往来，日渐增加，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事活动日趋频繁。一九一七年奉天（即辽宁）成立东三省官银号。一九二四年，桓仁县成立了东三省官银号桓仁分号，设经理、帮经理，主要职能是为军阀政府操纵货币发行，为商事活动办理汇兑。也办理存、放款，但对周期长、利息低的如农业放款

不予办理。显而易见，官银号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桓仁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主要有"现银"、"大银元"、"小银元"、"铜元"、"日金""奉票"和"流通券"等等。币制不一，金融混乱，奉票毛荒，泛滥成灾，劳动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非法组成伪满洲国。一九三二年六月，伪满政权在新京（今长春市）设立了总揽东北金融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各大城市（如沈阳、吉林等）成立分行，各县城设立支行。于是，桓仁成立了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桓仁支行，其职员大多是官银号的职员。由于货币制度不统一，流通区域受限制，直接影响商品交换的畅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东北财富的一大障碍。因此伪满中央银行发行伪满洲国"国币"，强行收兑原来的各种货币，流通伪币。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的名义，利用兑换的手段，垄断东北金融市场，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伪币逐年增发，货币贬值，带来了通货膨涨的后果，受害的当然是无辜的中国老百姓。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军投降，东北解放。我县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建立了东北银行桓仁支行，其隶属关系是条块结合，党务工作以块为主，业务往来以条为主。当时，桓仁支行属安东省分行领导。这年的第四季度，安东省分行发行了“本币”，印有“辽东”字样。翌年（1946年），东北银行桓仁支行对农业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放了低息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银行资金的支持下，桓仁县相继成立了贸易局，主要经销粮、棉、油和人民生活必需品。银行与贸易局密切合作，金融物价日趋稳定，市场购销两旺，改变了日伪统治时期的百业凋零和物价飞涨的局面，明显地体现了当时党所制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十六字方针。

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发动大规模内战，为了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军进行战略撤退，银行随军东移暂时停止。国民党的军队侵入桓仁后，毛荒的东北九省流通券飘流于桓仁市场，

通货更加膨胀，物价更加飞涨，人民群众又陷入困境。一九四七年春天，我军由战略撤退转为战略进攻，桓仁重见天日，我东北银行桓仁支行的组织机构重新恢复，在党和政府以及上级银行的正确领导下，重又发挥职能作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又得以贯彻落实。

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银行与货币的理论，在全国解放前开创了一条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全融路线，即先在各个解放区成立地方性银行，如东北的东北银行，热河的长城银行等，发行地方性货币，然后在全国建立统一的银行。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并陆续回收各个解放区的地方性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收回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统一兑换当时全国通用的人民币。桓仁县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桓仁县支行，同时开始兑换人民币。从此以后，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唯一的、合法的货币。

(二)

我县各个时期金融机构的变革情况如下：

1、**满清时期到中华民国初年**。这个时期，桓仁县没有官办银行，也没有私营金融行业，仅有一般民间的借贷关系。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奉天省（今辽宁）成立东三省官银号。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桓仁县成立东三省官银号桓仁分号，派来惠世昌（抚宁人）为经理，刘锡屏（盖平人）为帮经理，赵桂馨为警卫人员，经理、帮经理兼办具体业务，未设一般职员。桓仁分号成立初期未建营业门点，只在私营商号庆和发后院租赁房屋一间。在这时，俗称“驻栈东”。一九三一年才正式建立官银号营业门点，设在桓仁县东关大街，坐南向北，瓦房七间（即今桓仁县工商支行处）。

2、**日本入侵后和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秋，日寇侵入桓仁，接收了东三省官银号桓仁分号，改组为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桓仁支行（行址没有变动），设经理、帮经理各

一人，经理刘锡屏，帮经理牛世善（盖平人），警卫赵桂馨。还由奉天（即今沈阳）派来高广义、周福政、杨荣富等三名职员。当时桓仁支行内部机构设营业系和出纳系。营业系主任杨荣富，出纳系主任高广义，杨荣富兼总务，高广义兼文书，经理刘锡屏兼人事。一九三六年，桓仁支行经理刘锡屏与凌源支行经理卢鸿顺对调，帮经理改称副经理。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桓仁支行逐年有所发展，但变化不大。一九四三年，伪满洲国命令改组县级银行机构和名称，将伪满兴农合作社信用系的全部业务和人员，划归银行经管，银行改称兴农金库，其全称为"满洲兴农金库桓仁支店"，经理更称支店长，副经理更称支店长代理，仍由卢鸿顺和牛世善分别担任。兴农金库支店成立后，内部机构和人员以及业务都有相应的扩大，设出纳系、计算系、国库系、汇兑系和放款系，各系设主任一人，下有一般职员十人左右，另有三名警卫人员和一名勤杂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伪兴农金库将帐目结清，金库封闭，人员守门待接。当年冬天由县财政科长丁爱民（山东人）带队接收了桓

仁支店和瓦房七间、手枪三支、金库一座、伪币三十万元等财产。伪兴农金库职员，除支店长和支店长代理外，大部分被我东北银行留用。

3、**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年冬天，我人民政府接收伪满兴农金库后，于一九四六年春天正式成立东北银行桓仁支行，派来董伟健任行长。董伟健是山东莱阳人，系随军来东北的干部。行长以下的一般职员有十多人，除留用伪兴农金库的职员（如杨荣富、崔宗善等），还就地采用了五、六人，其中有张舜和史景新。县支行内部设总务、营业、出纳三个职能股，各项业务开展得比较好，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了应起的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我军于一九四六年秋进行战略撤退，银行停业，随军东移，路过沙尖子，撤到朝鲜的楚山郡。

一九四七年初，我军进行战略进攻。六月二十日，桓仁全境解放，桓仁银行由朝鲜楚山迁回国内。十月份，省行派刘慈孝、李景祥和宋举德三人来桓筹备银行重新开业。一九四八年春，省行又派黄世勋等四人

来桓，五月将桓仁支行改为桓仁办事处，重新开业。办事处内部设营业、行政两大职能组。刘慈孝任办事处主任，黄世勋任营业组长。一九四九年冬，刘慈孝调往西丰县，成永德任桓仁办事处主任。一九五〇年末，办事处扩大到六个职能组（人事、秘书、货管、农贷、会计、出纳），二十五名职员。

4、**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工作，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桓仁县支行。行长刘凤和（临江县人），内部机构设七个职能股（人事、秘书、货币管理、放款、农村金融、会计、出纳），各股负责人分别为王忠礼、梁悦增、曲表斌、于清和、张厚纯、宋恩福、张舜。人民银行工作人员一百一十一人。

（三）

货币起源于商品，它是在长期物资交换发展过程中，自发的从千百万种商品里分离出来而形成的。货币产生于原始公社末期，距今有四千多年历史。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时期，桓仁尚来建治；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原来的货币制度丧失了独立自主权。一

八七七年建县到一九四五年，桓仁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参杂使用。除银质的“大银元”本身有实物保证外，其它各种货币都不可靠。由于金融紊乱，使人民生活、生产和商品流通造成很大困难。新中国成立后货币制度才达到统一、稳定、独立自主、拥有崇高的信誉。下面介绍桓仁县各个时期通用的货币。

1、**中华民国时期**。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一年，桓仁市场流通的货币：

（1）现银。通称元宝，简称银子，每锭重量五十三两。一锭银子可兑换大银元八十元，兑换小银元八十五元。

（2）大银元。通称现大洋，简称大洋，俗称大洋钱或大头洋。单位为元，每枚重量为国库法定平银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

（3）小银元。通称现小洋，简称小洋，俗称小洋钱。面值有五角、二角、一角、半角四种，为辅助大银元使用。

（4）铜元。亦称铜币，俗称铜字，为银元的辅币。面值有二十文和十文两种。二十文的俗称大铜字，

十文的俗称小铜字。

（5）日金。即日本金票，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illegible]内与大银元直兑，流通量很少，仅在中朝边[illegible]。

（6）奉票。奉票是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汇[illegible]总称，面额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种，比值等于小银元十二角。发行初期，由于量少和有携带方便的特点，是受欢迎的，可与大银元直兑。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军费剧增，无限度增发纸币，奉票迅速贬值，币值下跌六十倍，即六十元奉票等于一元现大洋。奉票极度毛荒，百姓叫苦不迭。

（7）流通券。全称为桓仁县地方流通券，亦称桓仁县金融债券。流通券是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奉票毛荒，金融停滞，由桓仁县地方政府申请当时的省政府批准，以地方财政收入为担保面发行的地方债券。当时印刷二十万元，保留五万元，发行十五万元，通过农商贷款流通于桓仁市面。其面值有五元、一元、五角、二角四种。它可以与银元直兑，十二角等于一元。

（8）安东小洋券和天津纸币。这两种纸币是安东、天津两地发行的地方债券，是通过商贩和旅客带入桓仁境内，流通量不大。

2、日本入侵和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一九三二年三月建立伪满洲国，六月伪满政府颁布《货币法》，强行规定：一是货币的制造与发行集中于伪满中央银行；二是以纯银六二、三九、一毫为价格单位（元）；三是货币计算是十进位；四是发行九种货币，其中分主币和辅币。主币是纸币，有一百元、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五种。辅币为铸币，分白钢和黄铜两种，白钢的有一角和五分两种；黄铜的有一分、五厘两种。

伪满洲国强行发行国币后，币制虽然得到统一，币值得到暂时稳定，但毛荒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伪币贬值程度与奉票相似，买一尺家织布要十多元钱。

3、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一九四六年成立东北银行桓仁支行发行“本币”（有“辽东”字样）。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

入侵桓仁，国民党的“东北九省流通券”流入桓仁市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逃窜后，东北九省流通券成为一张废纸。我银行复业后改为桓仁办事处，逐渐收回“本币”统一使用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地方流通券”，简称“东北币”，通称“红钱”。一九四九年为贯彻党的“劳资两利”政策，东北银行发行了“工薪实物券”。

（1）本币。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十月，流通于当时的安东地区，与伪币并存，比值为一比二。本币的发行，对当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东北九省流通券。一九四六年十月开始流入桓仁市场，到一九四七年三月。面值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七种。此期间，物价昂贵，买一斤大豆需付二十元钱。

（3）东北地方流通券。一九四七年夏到一九五一年春，在桓仁市场与本币同时流通，后逐渐收回本币。这段时间金融物价波动不大，市场日渐繁荣。

（4）工薪实物券。简称工薪券，单位为分，按

工资额的百分之五十发放，只可到国营企业购买物资，不能多渠道流通和兑换。券额有五十分、十分、五分、一分四种。分值高低是随着布、米、油、盐、煤等五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下浮动的，当时分值为二角二分到二角三分。一九四九年，我国有三种所有制形式、五种经济成分，此项经济措施，对保障职工生活，减少货币投放，组织货币回笼，稳定市场物价起到积极作用。

4、**人民银行成立后**。建国初，桓仁地区仍然流通东北解放后发行的东北币。一九五一年四月，东北银行改为人民银行，桓仁县也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桓仁县支行，开始兑东北币为人民币，比价为九五比一。我国人民币自诞生以来，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爱，信誉越来越高。我国货币制度是纸币，未规定含金量，但它体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有雄厚的物资保证，它和解放前各时期货币制度有本质不同的区别。

莆仙戏班到桓仁以后

彭 湃　供 稿

桓仁历史悠久，戏曲（伎乐、百戏）活动，可上溯到公元五世纪时期。尽管戏曲源流出现较早，但由于封建社会对戏曲的卑视，致使史无所书志无记载，传记极少。迄光绪三年（1877年）怀仁（后改桓仁）设治立县时，据传县内已有“社戏”、“社火”等民间戏曲形式的活动，其轶闻虽有口头传述，但无据详查。按有史实为证，当以光绪十四年（1888年）为桓仁早期戏曲兴起之始。

桓仁戏曲兴起的缘由有二：一是当时县境遍遭水患，重修庙宇，开光祭祀，举行“社戏”所需；二是旧县衙及社会上层头面人物，出自本身喜好。故假借民意渴求，不惜重金接来戏班，设立一处最早的古戏楼，举行戏曲演出活动。由斯时起，为这荒山僻壤垦殖了戏曲之花圃，揭开了桓仁戏曲活动的扉页。

桓仁地处依山傍水之城，长白山支脉伸延全境，老岭源头之水沿三岔子注入佟佳江（今浑江），汇集

大小诸川蜿蜒县境，绕过县邑，向东南流入鸭绿江，一泻倾入黄海。县城位于五女山前、佟水中游南岸，江水由北向西转南，环绕城周，一座山城三面临水，群峦叠嶂，山清水秀，雄姿屹立，景色宜人，实为壮观。光绪十四年（1888年），县内“大水为患”（按原县志记载）：村庄、民宅土地惨遭淹没，城南原建庙宇亦遭水害。灾后，一片荒凉景象令人难睹。越翌年，县令遵奉清朝先制：“凡疆土遭海要隘皆立天后圣词，以示祭神庇佑兴发水运”的诏谕，报请盛京府批拨八千缗巨款，联同商民募捐集资，兴工重建天后宫庙院。

天后宫庙宇，按县旧志书所载和民间相传所云，始建于县设治之前。洪水期过，在旧址增建复修时，关东道教极为关注，曾派太清宫方丈葛月潭，远涉山路，由奉天（沈阳）城启行来桓视察指导。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庙宇，设正殿名为“灵慈殿”，塑天后圣母等金身。天后，据传说即是海神娘娘，乃殷纣时比干后裔兴化府（福建莆田）林愿的六女儿，死后屡显迹于海上，护士庇民，元朝至元中，受朝廷

敕封为“天妃”，立天妃庙享祭。清康熙年间追封为天后，谥号灵惠夫人。她被尊奉为海神娘娘，以佑皇天后土的安宁。庙院复修峻工后，按其旧俗，应备三牲祭品并设坛举行“戏社”，开光祭祀。浙江附生金作勋出任怀仁县令，他顺应民心又兼自身酷爱家乡戏曲。因此，令船帮远驰江南，由水路把江南莆仙戏班邀请来桓。

莆仙戏（又名兴化戏）的源流出于福建省莆田、仙游二处，是当地颇受民间喜闻乐见的戏曲，遍布于福建、浙江等地。当邀来桓的马伶班，是明代莆仙戏著名艺人马伶（名锦字云降）的后世弟子，演唱者仅来十多人。戏坛设于城南天后宫去莲花泡道路中间，距庙门一百米远的空闲地里（旧菜市）。戏台面积为四十二平方米，石基、泥墙、草棚，名为“吟凤阁”。首次演出，正值县城盛开娘娘庙会(旧历四月十八日)，远近百姓来逛庙、看戏者甚多。大戏连演三天，演出了《鸣凤记》、《东海孝妇》、《目莲救母》、《仙缘记》、《张协状元》、《拜月亭》、《梅花簪》、《单刀会》、《翡翠园》等节目。该戏班演唱俱佳，

器乐完备，以笙、管、笛、箫、唢呐、胡琴、琵琶和打击乐伴奏，颇具南曲特点，为人欢悦欣赏。据传说，金知县每次看戏都为之喝采称绝。船主、商号老板也解囊赏赐。

社戏祭祀后，江上水运更加兴旺。水筏、尖嘴帆船、敞棚槽子等船帮，由怀（桓仁）至安（丹东），舟楫往来如梭，往返载运木材、大豆、红粮、玉米、参药、食盐、布匹以及生产用具和其他生活用品，畅通城乡贸易。一时使桓仁县城、沙尖子街两处商埠码头，生意十分兴盛。桓仁戏曲艺术亦相继得到日益繁荣，各地戏曲班社时来时往，演出颇为活跃。

清末民国之初，外来戏曲班社尤为频繁。据采访九十二岁的戏曲老票友、书曲艺人刘云生(外号浪刘)及其老伴（现年八十二岁）所谈，当时由安东（丹东）、奉天（沈阳）、宽甸等地，经常有戏班前来我县演出。那时在县城东门里城隍庙前（现华兴商店后院）、农务会前院（现国营旅社院内）和东关小河沿两岸(现食品商店后墙北侧)，陆续设坛搭台演出。据老年人记忆，小河沿边所建戏园系木质结构，场地

可容观众近千人。后戏园停办，房舍拆掉，木料卖给安东，该地用此木料在东坎子建起一所戏园子。民国初期来桓演出的著名艺人有：碧玉花、三阵风、桑桂云、桑桂采、筱九霄、吴云楼、筱童等人。从宽甸来桓献艺的金家班，拥有一百五十多名演员，大部分都是小科班中的童生幼伶，剧种以河北梆子为主，演出了《白蛇传》、《盗御马》等戏。金家班不仅在桓仁演出，并到县辖四路区村活动。当地票友也经常展技献艺，刘云生老人那时正值风华正茂，曾登台演出很多传统佳剧，他在《大登殿》中饰薛平贵，在《斩黄袍》中饰宋太宗等，颇受好评，轰动一时。



桓仁教师发表《辞职宣言》前后

李戎　供稿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是时北伐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在人民血泊中建立起国民党南京政府。东北军支助蒋介石，在中原展开一场新老军阀大混战。全国面临着财政经济危机，加上辽东受严重水灾，广大劳苦群众，已无法维持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原奉天省于一九二九年规定小学教师的工资标准：高小教师每月二十四元，初小教师每月二十二元。而桓仁县这样的偏僻落后山区无力兑现。当年全县的教育经费仅为五万四千元。所以，桓仁县教师工资偏低，高小教师每月只发二十元，初小教师每月发十八元，不及省厅规定的标准。教师所得工资纵可一人果腹，而全家生活则难以维持。

一九二九年暑期，全县教师在桓仁街召开讲习会。会议期间，一百多名教师怏怏不悦，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县政府对教育界提出的增薪要求不予理采，尤其遭到农务会和商务会的反对，他们以教师质量低

劣为借口，不同意教师们的合理要求。但是食不果腹、含辛茹苦的教师们并不善罢甘休，坚决以罢教相抗争。

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党在吉林双城、延吉地区领导民众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桓仁县于八月十二日召开教育会议，到会一百一十名教师，向教育会长李德恒提出增薪要求。教育会向县政府提出书面申请，要求给教师增薪。而县政府将申请书批交地方机关研究，结果未得同意。全体教师对于政府的冷默态度十分不满，于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了桓仁县教育界《辞职宣言》，宣言中写道：

"……我同寅的薪金，又不及教方标准最低额，兴味不能引起，生活又没法维持"，"况且我同寅中优秀分子，因薪金低，多以辞职他就，剩廉价劣货的我们恐实负不起教育神圣之重大使命，更弄成红河下的糟势，误己误人，所以我们必定坚持辞职……"。

桓仁县教育界辞职宣言发表后，地方机关给予答复。他们安慰说："教师都是桓仁县人为桑梓关系，要照顾桑梓子弟学习。今年度财政没法安排，待下年

度一定满足你们的愿望”。由于政府当局搞精神安慰，使全体教师没有立刻辞职，只好忍耐等待，期望政府增薪。

新学期开学了，县教育会将地方机关答复意见通知到各个学校。并选派八个高小校长代表，到县政府重申坚持增薪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谈判，政府答应给教师增薪三成。

一九三一年暑假开教育会时，东北政治形势骤变，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东北面临着沦亡的危急关头，使桓仁政府为教师增薪三成的许诺变成泡影，桓仁教师辞职罢教之壮举也随之夭折。



基督教在桓仁的兴衰

初传鹰 李永勋 供稿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一些较小的派别。信仰上帝（或称天主）创造并管理世界，称上帝为千古不泯之天神。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天主教在中国称基督教的旧教，于十六世纪传入中国；新教，也叫耶稣教，于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国。

一九〇九年，基督教之新教传入桓仁。是年，丹麦人颜森夷牧师由宽甸来到桓仁传教立会，建立了中华基督教信义会桓仁教会，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信义会东北总会（设在今丹东市）领导，系信义会教派。教会会址在桓仁县城正街（今中心医院南边），设教堂一处，有青砖瓦房三十余间，内分礼拜堂、讲堂、学校、牧师住宅，另有土地数十亩。桓仁教会还在沙尖子设有分会。教会与分会的经济来源全靠信徒的捐解决。

基督教传入桓仁与西医西药的传入关系密切，几乎是相继而入，不少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及信徒，同时也是医药界人士。他们一面治病救命，一面讲道传教，宣传“入教不受鬼魔欺负，死后能上天堂”，“人的一生由主决定”，“靠上帝保佑，能免灾免难”，主张“今生要忍耐顺服，把希望寄于来世”。颜森夷是基督教桓仁教会的创始人，他来桓仁后，先是发展了李才、朱志清、王复生及其家属入教，之后逐步扩充信徒。

一九四一年丹麦徒法国占领，丹麦人全部回国，颜森夷离开桓仁。这时，桓仁教会由安东神学院毕业生阎玉林为牧师，同时派来该院毕业生祁达太、周玉凤为传教士。从一九〇九年桓仁教会成立，到一九四七年桓仁土地改革的三十七年间，桓仁教会历任牧师七名，传教士二十五名，先生十三名，基督会（主要管理教会的日常事务）组织成员有安汝舟、王海生等五名。

基督教会活动最盛时，信徒分布较广。桓仁县城的四个街道，沙尖子、五里甸子、拐磨子、北甸子、

业主沟、二户来等地中的十六个村都有信徒，最多时达二百一十九名。

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中，教会房产及土地被没收归公，神职人员迁出教会，桓仁基督教至此停止了活动。从"土改"迄今四十年来，基督教信徒因为年迈力衰、改变信仰等原因，没有宗教活动能力和意愿要求，基督教在桓仁已消声匿迹了。

当年担任过基督教会传教士的祁达太老人，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据他介绍，任传教士期间，一是传教，二是行医，月薪二十元左右。教会在发展教徒时，须经教友介绍，而后考道。考道主要考核是否真正信仰基督教，是否赞成基督教的宗旨，能否遵守教规等。经过考核认可后，由牧师领洗（即洗礼，举行入教仪式），使其成为正式教徒。教徒要靠自愿向教会捐款，每月做一次礼拜。每逢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等较大的节日，教会都举行活动，内容大体上是念圣经，唱赞歌，讲教规。教会不准教徒信奉鬼神，强调人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人类的衣、食、住、行，都是上帝赐给的，主张除恶扬善。桓仁教会是一九四七年

十一月解散的。一九四八年春，祁达太在桓仁县城正阳街成立“达太诊所”维持生活。一九四九年秋，经当时公安局长阎廷壁、卫生科长王兴国动员，迁往拐磨子街继续开办诊所。一九五一年秋，拐磨子区成立卫生所，祁达太到卫生所就职，参加了革命工作。祁达太参加革命工作后，信仰、观念都转变了。他说，若是没有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政府的照顾，我哪能颐养天年啊。我之所以有今天，全是共产党给的，什么天主、耶稣，我只信仰共产党啦。

小资料　领　事　馆

根据国际惯例和协议，一国派驻他国某城市或地区的代表机构。主要职责：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登记和帮助本国在驻在地区的侨民；办理护照、签证、公证；协助和管理本国船舶、飞机等。受本国外交部和驻在国的外交代表领导，同驻在地政府联系。日本侵略势力根据不平等条约派驻中国的领事，是凌驾于政府和人民之上的。与一般领事的作用不

伪管烟所和康生院的内幕

张凤浦　孙长礼　供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继承了英帝主义的衣钵，重演用鸦片毒害我国人民的故伎。这　沉痛历史，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鸦片通称大烟，也叫阿片、阿芙蓉，是用罂粟果实中的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毒品。主要成分吗啡，可入药，久用易成瘾，极难戒除，我国人民深受其害。

日寇用鸦片害人，始于大同二年至康德元年（1933至1934年）。那时，伪桓仁县公署允许私人种大烟，使许多人吸烟成瘾，大量毒品毒害着广大人民，处处有饥饿，时时有抢劫，人民生活不得安宁。

日寇视鸦片毒素已在中国人民中蔓延，既能起到广泛毒害又可获暴利的时机已到，遂对鸦片进行统管。据康德三年（1936年）《桓仁县志》记载："鸦片为病民之物，煤油乃必需之品，……对于病民之物，则严加取缔，处以峻法，以期永久根绝，而于

必需之品，则力谋普及，予以便利，以免奸商垄断……”伪中央为实施统管政策，于国内分区设立鸦片专卖署，下设驻在所。本县之驻在所（属于安东专卖署）于康德二年八月三十日组建。置主任中里大夫、出纳员高桥纯雄、雇员松田亨和王安仁。从此，鸦片统由专卖驻在所经管。出售的大烟有福牌、禄牌两种，不许私人自行买卖，如有违者，即为“犯大烟案”。处以没收、罚款和严惩。此外，还有鸦片零卖所。经伪政府批准的鸦片零卖所：一品鸦片零卖所，在今桓仁旅社后边，掌柜张述先，字祝尧，中国大学毕业生；日升鸦片零卖所，在今县委对过路东，掌柜王贵廷；还有两家鸦片零卖所，一家在今十字街派出所对过路东，一家在今华兴商场西侧。未经批准的有：小河沿的老贾太太和南关的齐寡妇以及其他数家。

日寇为了全面地掌管卖烟、吸烟和忌烟，遂于康德五年（1938年）在伪桓仁县公署行政科内设“烟政股”（后改称保健股）。股长日本人永友、属官焉与李，科员和雇员各一人共五人负责管理烟务。

康德五年，伪政府收缴各种烟馆，同时成立桓

仁镇管烟所，在今烟酒公司后院（小楼二层二十间）有周所长、会计、保管各一人，卖烟的外号叫刘三回子、熬烟的二人、看灯的五人，共十一人。最初大烟或烟泡，可以随便买，后来严加限制，须持烟证，才能领烟。吸烟证上贴有吸烟人的照片，是由城关警察署卫生系警长谢殿洪经手发放，规定每日发放的时间和烟量。年令较大的，有病的给烟量较多。每个烟泡重二分，每人每日给一至六个不每，单价伪币二角。穷吸烟的领烟之后，首先要拿出一部分，以每个烟泡四、五角钱，最贵一元钱的高价卖给无吸烟证的人，用这部分钱，做下次领烟的本钱。如此循环往复，来维持吸烟。领的烟泡规定在管烟所吸，持殊情况可带回家吸。桓仁镇管烟所每天吸烟的约有一百多人，领烟泡的约有三百多人。

二户来、沙尖子、拐磨子、普乐堡等四个主要地点，都设有鸦片零卖所。但规模较小，人员较少，制度略同管烟所。

康德六年（1939年）伪桓仁县公署在桓仁镇凤鸣村（今氧气厂处）建立康生院。此处是强占杨

珍家的房宅，正房十间做办公室和忌烟室，特角房两间做仓库。房宅原是民国时期杨家的柞蚕丝作坊，窗户特别小，为防忌烟人偷逃，所以选中此地。此外还强占了王选的农田，做生产用地。康生院里有常居主任吕文川，另有日本人谷川，还有会计、伙食管理员、厨师、大夫各一人，看守孙大个子、宋矮子等三人总共院里有九人。他们的任务是使吸烟人忌烟。将全县吸烟人分期分批强行入院忌烟，或因吸烟沦为盗窃扰乱治安的以及私吸烟的临时逮捕入院。也有少数父兄送吸烟子弟入院和极个别吸烟的不堪其苦，自己投院忌烟。院里有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一律不收。

忌大烟是个苦事，如同犯人坐牢一样。管教非常严厉，为防逃跑，门上锁，门口有人站岗，院围墙安装刺线。即使这样有一次一个业主沟女忌烟的跑了，抓回来，看守用木棒打得她喊爹叫娘，房东杨珍去说情，才算罢休。逃跑是院里最气脑的事，即使打不死也得脱层皮。入院三天后，烟瘾难消，大夫给点用大烟配成的丸药，聊以解瘾。以后逐渐减量，烟瘾轻的六、七天可出外劳动，烟瘾重的折腾十多天，需一、

两个月才能外出劳动。劳动时要站排，有看守监视，老忌烟者要监视新忌烟者。他们的劳动是种西瓜，收的西瓜除工作人员吃用外，还出卖赚钱，忌烟者也能吃点劣质西瓜。除了劳动之外，每天早晨要下操，由看守发口令，指挥操练，然后吃早饭，吃的是高粮米子儿和窝窝头，还吃不饱。白天有时上课，学习忌大烟的事，唱《大烟叹》歌，第一段歌词：大烟坑人又费钱，犯瘾实在难，举步两腿酸，打哈涕，泪涟涟，美味不能解馋。晴天还好过，最怕连雨天，妻子枕边劝，心中不以为然，兄弟姊妹，亲戚朋友，谁也不近前。第二段歌词：儿女一大堆，无米怎为炊，缺烟土，少烟灰，无奈吗啡锥，受尽皮肉苦，针眼一片黑，妻子泪双垂，怎能不心回，从今而后再不吸烟，一定守律规。院里烟瘾轻的约住一个月，烟瘾重的，须住两、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才能出院。院里房屋狭窄，一批只能收容五十多人，一年约能忌烟一百多人次，三年忌烟者约三百多人次。

康德八年（1941年）春，在桓仁镇西关（今朝鲜中学西侧）重建一所康生院，二十间房子，当年

秋天建成，东关康生院就迁至新院，照常工作。但在康德十年（1943年）五月失火，房屋烧毁。此后桓仁县再无康生院，戒烟一事亦成往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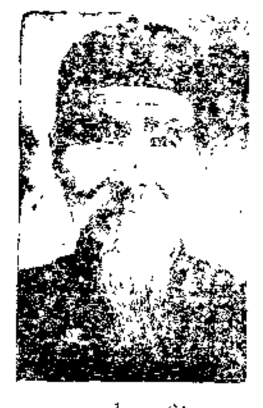
康生院历时四年半，约忌烟四百五十人次，真正忌好不吸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故病复发，重领吸烟证，再吸大烟，又入康生院。结果有的人还被鸦片毒死。例如，陈广东，是桓仁镇刘家沟村人，县南关初中毕业，善画。因吸大烟，曾两次进康生院，但还是忌不了烟。他父亲为此事气昏了好几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灯下教子”。一天晚上，院里灯火通明，用大绳子，一端系在儿子腰上，一端系成“勒脖扣”套在父亲脖子上，父亲打儿子，儿子是不敢跑的，如跑会把父亲勒死，即使这样管教，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因烟毒而丧命。也有的虽未被毒死，可已成废人。例如伪满时，桓仁镇东门外，有个谷家肉铺（旧址在今桓仁镇第一粮店），兄弟二人只有一个男孩，取名谷光国，娇生惯养，异常疼爱。稍长读书，中学毕业，考入沈阳同善医专学习，染上了大烟瘾，毕业为医学士，回家后，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游手

好闲，终天抽大烟。谷光国结了婚后，老哥俩相继去世，肉铺倒闭，收入断绝。谷光国遂将肉铺门房卖掉了，继而又将住宅、家具销售一空，生活仍难维持。后来卖掉老婆，姿意挥霍，终因生存无路，只得为人煮饭，聊以糊口，讨些烟灰，权且解瘾。最终是骨瘦如柴，弱不经风，度日如年。一个擅长医术的人，只因抽上大烟，竟然落到如此地步，着实令人痛心。

这就是日本统治时期的伪桓仁县管烟所和康生院管烟、卖烟、吸烟、忌烟的情况。结果是侵略者和统治者从中得利，而桓仁县人民却深受其害。



马　富——桓仁历史上的能工巧匠



马　富

王忠杰　供稿

马富，桓仁县城北关人。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卒于一九四八年春，终年七十六岁。他是我县历史上的能工巧匠，深受人们敬赞。

马富家境贫寒，其父原籍新宾木奇。因在那里无法谋生，于光绪三年前迁居桓仁（当时还没立县）。他只念一个月书，十四岁丧母，十七岁父又故去，大约十八、九岁成家。

其自幼务农劳作，心灵手巧，善钻研琢磨。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研制水磨，两年后，在桓仁建成第一家水磨碾坊，位于北江沿南岸山上。先是磨面，后又榨油、碾米等。既获利又方便于民。据康德三年《桓仁县志》记载："马富邑北关人，自幼务农，性聪慧，有巧思，发明水磨，置机轮于江中，置碾磨于山上，联以铁绳藉水力之冲激，俾碾磨自然转动，

且极迅速，省无限人畜之力，开设碾磨坊，颇获厚利。”

马富在发明研制水磨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对困难挫折不灰心，对其友屡泼“冷水”志不挠，坚韧不拔，终成功果。

原起，雨季田涝，马富在山坡理沟排水，无意中水流冲击铁锹翻转，发现水力强劲，若有所悟，颇受启发。事后，将大车轱辘置于江中急流一试，其旋转之力出乎意料，即尔开始研制水磨。先是机磨装于固定在江中的两船之间，后将碾磨移置于江边山上，用铁线连接江中水轮转动。因铁线无弹性拉力，转不多时渐渐被拉长变松，每天要剪短几次，数日后该铁线不能再用。马富为此伤透脑筋，昼思夜想，甚至病倒于床仍惦顾不忘。多想出智慧，弃铁线改用麻绳，每年须四根；继而又将麻绳挂蜡，每根可用半年；再后以钢丝绳取代之，方可长久使用。此项发明今天看来微不足奇，于当时说来可谓极不易也！

马富不仅“性聪慧，有巧思”，其勤俭、仁善精神为今人所不忘。

他虽“开设碾磨坊颇获厚利”，但从不追求富贵享乐，仍勤俭度日。每年只为其子做一套单、棉衣，非年节不大鱼大肉。经常拿衣布、粮食救济施舍穷人。荒乱之年，每日午饭盈锅增量，供管乞丐、逃荒者一饥。有年冬天于北岭发现“放路倒”（要冻死的人），他找人抬到家中，养治月余，愈后不收分文，送他走之。

马富信佛教和“道德会”，不信“万字会”。因佛教和“道德会”讲行善积德、家庭和睦，无论男女贫富皆可去听讲。而“万字会”则讲神鬼、传邪说，并只许富人参加，穷人不准入座。

马富所积钱财，不放贷，不营商，除捐助佛教堂和“道德会”外，便是修桥垫坑、筑路，为民谋益。一九三九年五月，他自筹资金，在城内三道街小河沿上，利用当地工匠，修起一座白灰沙浆石拱桥，方便来往行人车辆。该桥为我县交通史上第一座石拱桥，后人称它“罗锅桥”。

马富的一生，善事功德笔难尽述，今记事几件，聊作缅怀。

徐文海何许人也

崔宗善 供稿

民国末和伪满初期，在桓仁一带，提起徐文海，知者甚少，而提到徐司令或徐大炮，确颇有点名气。徐文海究竟何许人也，就我所见所闻略述片断。

徐文海，字伯阳，绰号徐大炮，系河北省任丘县人，当时年四十有余。自幼习武，成年后从事军事生涯。曾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麾下当过营长，直奉战争后，投至东北军，在军警督察处长黄显升部下任少校营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期间，张学良将军在蒋介石的诱劝下，归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张学良将军仍以大元帅之职居之。翌年春，蒋介石唯恐张学良势力扩大，即对东北军进行整编，以便削弱张学良将军的势力。徐文海在被整编后，就参加了“奉天警察训练班”即“新民同泽储才馆警察班”。经过一年训练后，又经黄显升安排到凤城，任县公安局长兼县警察大队长。

欺世盗名 伪装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当凤城县各界人

士，在东北各地抗日斗争形势影响下，纷纷起来抗日时，徐文海也举起抗日旗帜，将其所属警察大队七、八百人，拉至距凤城县东约四十里的石头城、狐仙洞一带，声称抗日，而暗中却与当地地主和反动势力勾结，以图扩大自己的实力，抬高个人的地位。当时也曾与抗日军邓铁梅、姜振东等部进行联系，表示愿与他们共同抗日。初期，也曾与日伪军打过几仗。但实际表明，徐只是敷衍了事地打打，见硬就回，并非真心对抗日寇。仅以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姜振东部相比，就明显不同。当时抗日义勇军十九路二营营长姜振东是千方百计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与日军作战。如一次姜振东闻知凤城县通远堡车站，驻有部分日军，随即率领部下八十余人，运用战术一举攻克了通远堡车站，消灭日军数十人。此后，姜振东率部又多次主动出击，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因而日军总想除掉姜振东这支抗日队伍。

当时，日军已观察出徐文海的态度，抗日是假，坐视观望扩大实力是真。于是就派当地权势人物，去说服徐文海投靠日军，许诺：一将姜振东营长抓获交

给日本侵略军，则任徐文海为“鸭绿江剿匪副司令”，授少将军衔（正司令是原于芷山所属的一团长姜全我）；二将姜振东抓获后，将姜所属队伍，编入徐文海部队；三徐文海的部队，全换新枪，全给薪饷。这三个条件，打动了野心勃勃的徐文海。

出卖志士　投靠求荣

徐文海在与日本人的秘密策划下，便派其能说会道的参谋某某，与姜振东洽谈。说是徐愿与姜合作，共同抗日等谎言。姜振东信以为真，就同意其所部与徐合在一起。而后徐文海以庆贺为名，设宴招待姜营长。席间，徐文海按事先部署将姜捆绑起来，交给日本人请功。同时将姜的队伍全部缴了械，编入徐文海部队。此后，徐文海肩上带上了满金一个豆的少将军衔，爬上了“剿匪副司令”宝座。其部下也换了新装、新枪，在帽子上都套上白布罩，百姓称为白帽子队。从此，徐文海就干起围剿抗日军队的罪恶勾当。

助纣为虐　杀我同胞

徐文海投靠日寇以后，扯掉“抗日”的面纱，调转枪口，公开与人民为敌，向我抗日自卫军进攻。一

九三二年五月间，受于芷山(已投靠日本人)之命，姜全我、徐文海率部攻打我驻宽甸县的自卫军。当时，我驻宽甸县的抗日自卫军十四路司令时远岫，立即率队与姜、徐两敌英勇奋战。打了数日，终因实力悬殊，撤出了宽甸城。时远岫即电告通化自卫军总部，唐聚五即令一路司令唐玉振、五路司令张宗周、七路司令郭景珊和十三路司令王乐山(驻牛毛坞)赶赴宽甸支援，任张宗周为前线总指挥。接命令后，各部相继赶到并包围了宽甸城，经过几天的的鏖战，打得敌人伤亡很重，姜全我、徐文海率残敌逃之夭夭，我自卫军收复了宽甸县城。

敌人不甘心失败，于六月六日又从鸭绿江彼岸，调集日炮、步兵千余人，由蒲石河上岸，攻占了宽甸南部的永甸、长甸两要镇。在狗鱼汀，我抗日军与日伪军进行了激战，双方伤亡都很重。敌人在飞机掩护下，逐步向宽甸城逼近。并用飞机撒传单，声称如自卫军不撤出，就炸毁宽甸县城。为了保存县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唐聚五总司令即令我部撤至牛毛坞。但敌人继续尾追，我抗日军分东、南、西三路迎敌激战。

因枪支弹药不足，我十三路从西线撤走，五、七两路从东南两侧撤至砍川岭布防。

七月十六日，姜、徐又率日伪军八百余人，向我砍川岭阵地进攻，被我自卫军击退。这一仗敌人伤亡很重，龟缩于牛毛坞。九月七日我五、七两路由张、郭司令率领，从砍川岭出发，又一次奇袭了牛毛坞。姜、徐两敌抵抗不了，从石头河、太平哨等地，调集近千人日伪军相助，经过四昼夜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因敌众我寡，我抗日自卫军又退回砍川岭，与姜、徐伪军筑阵对峙。

血满双手　进入桓仁

一九三二年九月末，经北平张学良将军同意，唐聚五总司令将桓仁境内的抗日自卫军全部撤出，经通化至抚松县境内。

徐文海即率"白帽子队"的八个中队，约八百余人，分东、南两路，进入桓仁。除其七中队由黄金兰率领，由宽甸过江经沙尖子进入桓仁外，其余均由徐文海率领，由南路普乐堡进入桓仁。西路为日军骑兵高波一旅团、骑兵第四旅团、步兵茂本第十四旅团和邵本良、廖弼宸伪军，向桓仁进犯。从此，桓仁县就沦为日伪手中。

徐文海到桓仁以后，将其八个中队分别布防于各要镇：一中队闾秃子（内有骑兵）驻桓仁镇；二中队高焕章驻横道川；三中队肖广盛和六中队谭学才驻业主沟和拐磨子一带；五中队侯某驻北甸子；七中队黄金兰和八中队驻二户来、八里甸子一带；四中队王志强驻沙尖子。

徐文海将其"把兄弟"、"八大金刚"分别布署在四周作为保镖以后，就在桓仁城内享乐了。真是吃喝嫖赌，为所欲为。他已有三个太太，大太太留在凤城，二、三太太随队来桓，在一栋房分东、西住之。但还不满足，经常出没于"朝鲜料理店"（妓院），喝花酒。更有甚者，每当戏院子由外地请来的坤角都要留在他那里住上两宿，才能让其演出。记得有一名叫肖艳舫的不但初来桓时，留其同欢，平时徐文海高兴时，也要找去同宿玩乐。徐文海为了满足其私欲，还别出心裁自制"钱贴"（即用类似纸币大小的纸印上金额须钱花），在市场上通用。各商号收到这种"钱贴"，还不敢拒用。后来经商务会研究，各商号收此"钱贴"后，如不得兑换时，由商务会给予兑换。徐

文海为了大发其财，还在桓仁城内设有多处赌场，如宝局、押会局等，牟取暴利。此外，还让人们种了最后一年大烟，以满足其嗜好，收刮民财。徐为了欺世盗名，还让马富监工在原天后宫庙后边小河上，修建一座拱桥，以其字命名为伯阳桥，以抬高其声誉，留名后世。

徐文海自进入桓仁以后，其"鸭绿江剿匪副司令"少将的头衔，已经过时了。日伪委其为桓仁县警察局长兼警察大队长之职。但徐总感到警察局长不如司令大，仍以司令自居。为了在中国人面前，显示他不怕日本人，每逢外出时，总要带上四个马弁在身前身后炫耀其威风。有时与日本宪兵队（现百货公司东侧）或日本守备队、（现医药公司处）产生磨擦，徐即在十字街处，向东架上机关枪，以示威严。后来，日寇越来越感到对徐不放心，为了掌握徐的动向，便派一个叫柳田的日本人认徐为干父，打入内部。而徐以干父自居，对柳田常以斥骂对之，不听柳田那一套。尔后又派一个名叫和权者的日本人为徐的指导官。但徐遇事还是不听他的，自己说算。从此，日本人感到徐文海不可靠了。

咎由自取　死有余辜

徐文海的粗野、放纵，引起日本主子不安，随想将徐除掉，报请奉天日军总部待办。此消息被徐察觉了，便于十月下旬某日，暗中令其亲信：西路各中队在指定时间到八里甸子待命；徐文海率东、北路各中队经普乐堡到八里甸子会合。当徐由桓仁城拉出时，桓仁镇分局长孙夺标没有跟徐走。还有五中队侯某没有跟走，而且向桓仁的日本人投降了，徐得知后非常气愤。

当徐文海将其所部拉到普乐堡时，日本人即迫使桓仁农会、商会及士绅们，到普乐堡去劝降。并以劝降的士绅和全县人民的生命来保证徐文海回桓仁后的安全，还给了徐"官复原职"的保证。徐信以为真，即率队返桓。至南江沿时，江已结冰。徐率队先过了江，其马弁牵着徐的大青马在后，落入江中，经多人推拉方到江边。当时有人则说这是徐的不祥之兆。当日徐先到县农会落脚，徐一进屋就大发雷霆说：我这次回桓，要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不日徐即将未跟走的五中队长侯某除掉了。

徐文海回桓后，日本人为了稳住徐，即唆使农、商各界士绅设宴为徐洗尘。后日本人也多次设宴款待，表示对徐的慰藉和信赖。在徐回桓不到一个月的某日晚上，日本人又邀徐去“朝鲜料理店”喝酒。席间将徐灌醉，当即将徐捆绑起来。同时将外间徐的马弁缴了械。其实，这是日本人早已安排好的秘密计划。事先由省日军总部派两名大佐来桓，并备好铁甲车和飞机。当晚将徐扣押后，翌日即以铁甲车将徐送西关飞机场（那时西关有民航机场），用飞机将徐文海送到沈阳，而后处决了。

徐文海之死，与其他汉奸、特务的下场一样，是投靠日寇、为其效劳、又被其主子除掉的可耻下场。徐文海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浅谈桓仁出土金代官印之谜

王从安

一九五〇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桓仁镇凤鸣村当时十一岁的小学生杨文，同他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在距县城东约五公里的歪头砬子附近浑江岸边的山岗上拣蘑菇，顺着地面布满小石头的小壕沟往下走，一脚踢出个大印来。这颗印于一九七九年交到了本溪市博物馆。印，"铜质，呈正方形，方二寸二分，厚六分，长方梯形柱状纽，纽高六分，重二十一两。印正面阳刻汉文九叠篆字：'行尚书六部印'六个大字。印纽左边侧面阴刻'尚书印'三个字。印纽上端阴刻一个'上'字"。经鉴定，是金代之印。（见《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文集》）

这颗"行尚书六部印"是金代什么时期、什么官职的印？为什么会失落在今桓仁县城附近？这要先从金代的官制说起。

金代官制，《金史、百官志》：在中央有尚书省，有尚书令一员（正一品），其下有左右丞相各一员、

平章政事二员都是从一品，“为宰相，掌丞天子，平章万机”。还有左丞右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为执政官，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在尚书省之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各有尚书一员是正三品。这颗出土的金印，是“行尚书六部印”，显然，它既不是尚书令的大印也不是六部中任何一个部的尚书印。《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文集》中《本溪地区发现金代官印》一文认为这颗金印是金初“六部尚未分立”“统为尚书省管辖”时的“六部尚书之印”。笔者认为其论据是不够充分的。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行尚书”中的“行”字，“行尚书”不是尚书省，而是“行尚书省事”的简称，即尚书省的代表机关亦即尚书令的代表官员。《金史、阿里不孙传》在记述其历任职务时有“改御史中丞、辽东宣抚使，再阅月，权右副元帅、参知政事、辽东路行尚书省事”的记载。行尚书省事这一机构和官员，平时是没有的，只在特殊情况下才设置。《金史、本纪》：“卫绍王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十一月徒单镒（时为右丞相）

请置行省于东京(今辽阳)备不予，上不悦曰：‘无故遣大臣动摇人心’。未几，东京不守，上乃大悔”。《金史、徒单镒传》：“镒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愿望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镇之’。卫绍王不悦曰：‘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顷之，东京不守，卫绍王自讼曰：‘我见丞相耻哉’”。徒单镒之请金主在辽东设置行省未被批准，说明在那时辽东还没有行省。行省即行尚书省事，亦即印文中的“行尚书”。因此，可以认为“行尚书六部印”，即行尚书省事兼行六部事之印。不能把“行”字去掉加以简单地颠倒，认为是“六部尚书”的印。事实上历代只有某某部尚书，而没有“六部尚书”这一官职。在金代，《金史、百官志》：“六部，国初与左右司通署，天眷三年始分治”，是说在天眷三年之前六部的工作均在左右司内通署。还没有划分六部，又怎么会有六部尚书之印呢？金代的官印，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时规定：“三师、三公、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重八十两，驼纽”（见《金史、百官志》）。但对行尚书省印的质

量、重量、规格都没有记载。《金史、百官志》只是记载了在正隆元年更铸新印之前的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行尚书省以其印小，遂命拟尚书省印小一等改铸”的字样。天德年间的尚书令印有多大？不得知，改铸前后的行尚书省印有多大，也无从考究。尽管不能从这一方面去考究，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却可以大体上肯定它不会像《本溪地区发现金代官印》一文所论证的那样，说它是金初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以前的旧印。历代的统治者对旧印的处理都是极其严肃的。《金史、百官志》：“天会六年始诏给诸司，其前所带印记，无问有无新给，悉上送官，敢匿者，国有常宪”。一般地讲，更换印记都要以旧换新，现在也是这样。旧印，怎么会失落在民间呢？

这颗金代的“行尚书六部印”既在今桓仁之地出土，证明它不是金的上京路或其它路的行尚书六部印，因为其它各路距今桓仁失之过远。它应该是东京路（即辽东路）的行尚书六部印。金代在辽东置行省，始于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初任官员是完颜阿里不孙，他的全部官衔是：“权右副元帅、参知政事、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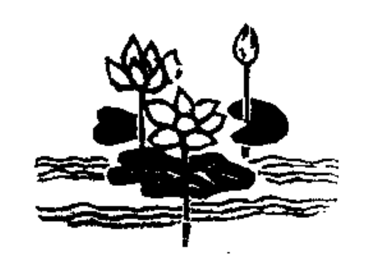
东路行尚书省事"（见《金史、完颜阿里不孙传》）。从完颜阿里不孙贞祐四年任辽东路行尚书省事起，到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以后，蒙古占领了金的辽东大部地盘，辽东行省已远迁到辽北时为止，共有四任三人任辽东路行省。《金史、本纪》：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四月以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兴定元年"十二月庚戌，元帅左监军蒲察五斤，进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充辽东行省"；兴定二年四月"以户部尚书夹谷必兰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参知政事，行省于辽东"。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九月辽东行省置于严州，严州是那时新从石城县中分置新设的州，石城县即今辽阳城东五十里之燕州城。到了金的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辽东行省已移设到咸平路即今开原县的老城去了。可以认为这颗在桓仁出土的行尚书六部印是他们三任"行尚书省事"中的一个人的官印。那么，是三人中谁的大印呢？又怎么去失落在今桓仁呢？一般地说，在正常情况下，官是不能离印的，丢了印就不能作官。查金史，三人中唯有完颜阿里不孙

是在兴定元年九月被叛人杀死在任上的。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官被叛人杀死了，是有可能失落大印的。那么，这颗印是不是完颜阿里不孙之印呢？完颜阿里不孙"兴定元年，真拜参知政事、权右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见《金史完颜阿里不孙传》）婆速路即今丹东市九速城，婆速路的辖境包括今丹东、本溪地区及新宾县境并鸭绿江东岸朝鲜义州以北的沿鸭绿江一带。今桓仁金境那时统属婆速路。完颜阿里不孙"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是有可能经常到今桓仁一带活动的。另外完颜阿里不孙既是行尚书省事，六部当然归尚书省统驭，他也可能兼行六部之事。因此，他的官印是"行尚书六部印"。他有权任免正五品刺史以下诸官，这显然是六部中吏部的职责。

兴定年间前后，辽东一带的局势是相当紧张的，金朝在辽东已岌岌可危。在完颜阿里不孙行尚书省于婆速路时，金的叛将蒲鲜万奴占据着辽东(今辽阳)，并且"侵掠婆速之境"。这之前，蒙古兵马也曾攻掠过东京（今辽阳）、懿州（今阜新），契丹人耶律留

哥还曾聚众掠韩州(今梨树县境)、据广宁(今北镇)、占咸州(今开原)自立为辽王，后来依附了蒙古。他的伙伴耶律厮不，还曾背叛了他称帝于澄州(今海城)。锦州也有人自立为王，蒙古兵还陆续占领了锦州、广宁、懿州等地。各处混战，金的"辽东兵势愈弱"，不少将领不听宣调，甚至各有异志。作为参知政事、权右副元帅，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的完颜阿里不孙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叛人杀死的。《金史、完颜阿里不孙传》："初留哥据广宁，知广宁府事温迪罕青狗居盖州，……与伯德胡土约为兄弟。青狗兵隶阿里不孙，内猜忌不协。蒲察移剌都尝奏青狗无隶阿里不孙。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诏，阿里不孙杀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孙。既而胡土率众伐高丽，乃以兵戕杀阿里不孙"。胡土是在兴定元年秋七月十四借领兵伐高丽的机会，动用武装力量杀死阿里不孙的。地点应在婆速路境内赴高丽的路上的今桓仁一带。完颜阿里不孙不仅是代表中央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同时还是行元帅府事的权右副元帅，是这一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当然是有兵的，胡土杀死完颜阿里不孙，肯定会有一番

较斗。可以这样设想：当伯德胡土率兵伐高丽，路经今桓仁一带时，完颜阿里不孙恰好正在此地。胡土就杀掉了他，替青狗兄弟报了杀头之仇。在一场较斗的兵慌马乱中，“行尚书六部印”就失落在地上。出土时不是深埋在地下，而是一脚在乱石中踢出来的，足以证明这个情节。因此，可以初步认定这颗“行尚书六部印”就是金代后期的行尚书省事于婆速路的完颜阿里不孙之印。



下古城子——高句丽平原城

苏长清

（一）

下古城子古城址，位于桓仁镇西四公里的浑江右岸。六河乡下古城子村就在这座古城里，东临南流的浑江，南与雅河乡南边哈达村相连，西、北与上古城子村接壤。

下古城子古城址是一座土城。从残存的横断面看，有明显的夯土层，每层的夯土不一样，有黄土、泥沙土等。城墙除西北角残存二米高外，西南面城墙已无迹可寻，东墙早在七、八十年前被洪水冲毁。

现在可以看出，城内高出城外地面零点五米至二米。北墙走向东偏南二十度，残长241.5米；西墙走向北偏三十度，墙基残长162米；南墙走向东偏二十度，墙基残长188.6米；东墙已不存在，仅剩被洪水冲刷的一条长二百余米的江崖子。

（二）

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至卒本川

（《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地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这就是说，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从北夫余至纥升骨城（今五女山城），建立了高句丽国。从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三年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回内城（今集安县城），在桓仁定居四十年。

高句丽这支民族，建山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敌对者的进攻，巩固其统治地位。因此，必须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高山，随着山势走向而筑城。属于山势高，立陡石崖的绝壁不筑城，属于山势低、可攀登的沟壑分段筑城。那么，纥升骨城正是朱蒙在建国初期，所需要的山城。实为不可多得的一座天然城堡。但是，我们对现在的五女山城进行了考察，尚未发现建筑遗址。只在山顶内城，清光绪年间修建的玉皇观遗址四周耕地里，发现了高句丽、辽金时代的遗物。又在外城东壁的山坡上，发现了用打制的牛角石块砌筑的梯田，有的两层，有的三层，长达三、四十米。是否是建筑遗址，因未发掘，尚难确定。

由此可见，高句丽这支民族在战争时期将军队、老百姓，集中到山城进行防守，巩固其统治地位。那

么，在和平时期，都城的高句丽人，又在什么地方繁衍生息呢？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在五女山城附近地区，对山城旁的长岗村（已被浑江水库淹没）、山城前的刘家沟村、山城后的大东沟村，进行了多次考察，没有发现平原城址和墓葬区。直至一九七八年八月份，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历史专业的师生，来桓考察五女山城、下古城子古城址时，初步确定，下古城子古城址，有可能是五女山城的平原城。山城与平原城按要求，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山城与平原城相距五公里左右；

2、必须在同一江河旁；

3、城门相对可以互相瞭望。

因为五女山城与下古城子古城址，同在浑江右岸；如从原始马道走有五、六公里；下古城子古城址北门与五女山城西门遥遥相对。符合上述三个条件。

（三）

五女山城与下古城子古城址，除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外，还有什么理由初步确定下古城子古城址是五女山城的平原城呢？其主要依据是出土文物。九年来，

经过省、市、县文博部门对山城、平原城的多次普查和打探沟，出土的一些文物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属于高句丽时期的，年代最晚的，是属于辽金时代的。

从下古城子古城址出土的文物看，不论村民挖窖储藏菜，挖地基建房或文博部门试掘，揭开地表土挖至半米左右，绝大部分是辽金时代的灰色布纹瓦、砖、白瓷铁花残片、人面瓦档等，有的地基几乎填满了灰色布纹瓦砾。再向下挖一米深左右，绝大部分属于高句丽时期的红灰色夹砂的桥状陶器耳、陶罐底、口沿、兽面瓦档和打制的石网坠以及磨制的石矛、石斧、石簇等。

在五女山城内城的玉皇观遗址附近，出土的高句丽时期的夹砂红色陶器耳、瓦甑、陶罐等残片；辽金时代的灰色布纹瓦、陶器耳、白瓷铁花等残片，这些遗物与下古城子古城址出土的遗物，经过鉴别是同时期的。

在五女山城附近虽未发现高句丽早期积石墓群，但在距离下古城子村一公里远的上古城子村的耕地

里，发现了高句丽早期的中、小型积石墓群，计百余座。其中：中型积石墓七座，“文化大革命”期间搞农田基本建设拆除两座，周长三十至四十米。这类墓设方坛，不设阶梯、围墙和护墙。从内部结构看，用石块、石板砌出单室、双室，墓室平面皆作长方形、长约二米余，宽高约一米余，前壁正中或左侧砌石甬道，无随葬品。在中型积石墓附近，散布着墓室平面不规整、高仅半米左右的小型积石墓。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下古城子古城址，可能是早期高句丽的平原城。和平时期都城的高句丽人在平原城繁衍生息。由于在平原城居住的时间较长，所以，在城址附近，出现了百余座的积石墓群。由此可见，五女山城，由于是战时居住和固守的城堡，一般地说，山城附近没有积墓群。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高句丽早期的下古城子古城址，是纥升骨城（五女山城）的平原城。

清代桓仁的封禁与开发

王从安

桓仁建治前，在明代是建州女真的居住地。建州女真的著名领袖李满住、王兀堂先后在十五世纪中叶和十六世纪中叶活动在这一山高林密、水源充足、土质肥沃的地方。在这块宝地上，十六世纪末又发展了建州女真中素称兵精马壮的栋鄂部。一五八八年四月，栋鄂部长何和礼率其部众一万多人，归附了他所尊崇的兴起于今新宾县境内并在后来被明朝敕封为都督、龙虎将军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从此，富饶的浑江流域的今桓仁全境，就成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并进而与明朝对峙抗衡向明朝发动进攻的重要兵赋之源。桓仁这块宝地，在建治前，对清朝的统一天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从一六四四年清军进关时起，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二百年间，却几乎变成了无人居住的荒野。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的当时，满族人民多数都随军"从龙入关"。清初满州八旗，军队总数不起过六万，

为了补充战争中减员，进关前，几乎尽数征集了满族壮丁。由于军队进关时携带着他们的眷属，所以清军入关后的东北，几乎成了无人的荒野。作为当时满族居区的桓仁全境，在清军进关后，满族人口已残留无几了。

一六四四年顺治皇帝即位北京不久，就在原明朝辽东边墙的基础上，开始分段修筑名为盛京边墙的柳条边墙。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成了这条边墙的修筑。修筑柳条边墙，其主要目的是封禁边内的清朝发祥之地，以保护其"龙兴重地"，不准八旗以外的汉人或其他民族进入边内垦耕和放牧。同时还对柳条边外的一些特产区和围场采取了立封堆的办法一律加以封禁不准边内人民(包括满族)自由流动到边外去，以保护其贵族经济利益。盛京边墙南起凤凰城西南，经凤凰城边门向东北至今凤凰城县境内的叆阳边门，再向北至今本溪县境内的碱厂边门，由碱厂再向东北至现在新宾县的旺清边门，经旺清边门向北至今清原县境内的英额边门和开原县的威远堡边门。由此转折而向西南，直奔山海关接长城。这条边墙的碱厂至旺清门一段，恰好把今桓仁全境隔为边外。时至现在，在

今桓仁与新宾两县接壤处的桓仁县业主沟乡二道沟村附近以及木盂子镇高俭地村的头道沟都能看到旧柳条边墙遗留的痕迹。那时的桓仁，既属于边外又是清朝统治者霸占人参产地的封禁区，不仅满族连其他民族也不能在此居住。因此，那时的桓仁就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旷之地了。

封禁区的东边外一带，进入康熙年间，就有了违禁来此“建家屋垦土地者”。地方政府也曾加以禁止。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同朝鲜之间有过一个协议，大体上规定由凤凰城边门外附近开始至旺清边门外划为一线，在此线与鸭绿江之间保留一块空间地带，严格控制各族人民进入，并绝对禁止朝鲜人越境进入禁区。这一协议，使浑江流域的今桓仁全境和宽甸平原，在其它地区的封禁已开始放松的时候，这里仍属禁区，长期得不到开发和利用。

正是这几种原因，桓仁这块已经苏醒了的大地，又沉睡了二百多年。

桓仁一带的再开发，为时较晚，大体上始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后的道光年间。此时的东边外，虽仍

属禁区，然因“法度之废弛，流民随时入侵此地”，违禁来这一带开荒垦地的逐渐增加。一八四二年奉天将军曾派官到这里“拿捕犯人，禁毁窝棚”。但是到了一八四六年又发生了“结庐垦地”之事。清朝地方政府一方面严密搜查，不准留“寸椽尺土”，另一方面也认为“鸭绿江沿岸一带，山场辽阔，草木丛生，虽派员搜捕，恐致查勘不周”。事实上整个沿鸭绿江边的东边外一带，包括今桓仁全境，那时已是有人居住耕垦了。以桓仁的第二大镇二户来镇为例，当年车、毛两家来此落户，因以得名为“二户来”，他们迁来的时间，推算正是道光年间。以后人烟聚集，现已发展成为近万人的大镇了。当时违禁迁来落户的主要是汉族和满族，此外，也有从朝鲜私自越境来的朝鲜人。

清朝后期的封禁，随着政治的腐败，封禁只是给了官吏以肥私的机会，禁止成了形式，来此开垦者逐渐增多。咸丰末至同治初“移民之多数，实可惊异”。同治六、七年间有一个叫何名庆的人，上书奉天将军要求开发旺清边门外的六道河地方。当时的奉天将军衙门表明的意见是：“沿边设门，定制森严，孰敢轻议

历朝之旧章，妄献展边之策。况瑷阳、凤凰等边门与朝鲜各浦堡接壤，关系太巨。……但今观何名庆等之陈情，若因守旧制严行驱逐，则数十万之移民，一朝失多年之基业，衣食困穷之结果，必相率而为匪类，今日之事，宁可从顺舆情……”（见《清朝全史》）。这无疑是默许了封禁的解除。于是由凤凰门至旺清边门外既垦之地，大为增加。据《清实录》记载，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盛京（奉天）将军都兴阿奏陈皇帝说：“自凤凰门迤南至旺清门北（边外），查得已垦熟地九万六千余垧，男妇十余万人”。

何名庆要求开发的六道河地方，就是现在桓仁县城附近的六道河子一带。它是汇入浑江的六河河口，地面平坦开阔，水草丰盛，土质肥沃，交道方便。无怪十年后的一八七七年，怀仁设县，选中了它建为一县的首城。六河的开发，是清代正式开发桓仁的开始，是桓仁建县的前奏。从道光年间开始，大体上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终于在这个当时有七千零四十七户，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一口人的地区，同都属东边外的宽甸、道化两县一起，设官建治，成立了怀仁县。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因为与山西省的怀仁县同名，才改成了桓仁县。

编　后

《桓仁文史资料》第二辑和大家见面了。

桓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自从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以来，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帮助和各界知情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地感谢。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惠及后事，意义深远，作用重大的光荣任务。它不仅能使我们"温故知新"，承前启后，而且对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有着现实意义。它将通过各方面人士以亲历、亲见、亲闻的独特形式，真实地记录桓仁发生过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具体地反映桓仁各个侧面的历史面貌。我们将继续征集文史资料，陆续编辑成册，热情欢迎各界知情人士撰写稿件和提供线索，使我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向前迈进一步。

由于我们编辑文史资料工作经验不足，经历、知识和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对本辑文稿提出批评、补充、订正，以便改进工作。

《桓仁文史资料》第二辑编辑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